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2期（民國110年6月），1-5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競逐新文化
——《新文化辭書》的編纂工程與思想圖景[*]

陳建守[**]

摘　要

本文討論一本應新文化運動之潮流而生的百科辭書：《新文化辭書》的出版史。作為第一部躋身「新文化」行伍的百科辭書，現有的研究集中於兩點：第一，這本辭書是新文化運動下的產物；第二，即便沒有任何資料證明，但可以推斷《新文化辭書》的資料是從既有的材料中蒐集得來的。這樣的結論仍有未竟之處，本文嘗試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探究以下幾個面向：商務印書館內部的改革計畫與《新文化辭書》的面世、《新文化辭書》編輯團隊的背景為何？《新文化辭書》的編輯團隊是利用何種思想資源進行編纂工作的？與晚清同類型的著作比較，《新文化辭書》的特色何在？最後，《新文化辭書》內中收錄的詞條呈現出何種思想樣貌？本文提出《新文化辭書》誕生於商務印書館內部的編輯需求，以及誕生於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雙方爭奪「新文化」的生意經這兩層面向。相較於晚清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新文化辭書》按照字母次序編排的形式和詞條內容的詳盡，使其看起來更像一本「現代」的百科全書。《新文化辭書》大部分編纂者都具備留學日本的經驗，內容上吸納了日本百科辭書的成果，見證了日本百科辭書的影響力。關於《新文化辭書》詞條內容的選編，不能以「拿來主義」一筆抹煞商務印書館編輯團隊的用心，《新文化辭書》的編輯團隊傳遞了他們所認為代表「新文化」的各色詞條，這當中包括當時流行的「主義」思潮和「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相關理念。

關鍵詞： 新文化辭書、新文化運動、商務印書館、百科全書

---

* 本文感謝審查人細心糾謬，對本文的修改有極大的幫助，謹此申致謝悃。本文寫作期間，亦承蒙多位師友不吝提點，在此一併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0年7月2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3月26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　言

1923 年 9 月，在北京發行的《順天時報》上有一則針對「新文化出版物」的廣告消息，預告一部《新文化辭書》的出版：

> 我國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國人之知識慾望，突然增進。本埠商務印書館為適應此種潮流，擬輯行大規模的辭書一種，名曰新文化辭書，以饜國內學子求知之慾望。是書即新學識百科辭書之意，包羅政治、宗教、經濟、法律、社會、哲學、文藝、美術、心理、倫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學方面必需之知識，並附以對於各方面有偉大貢獻之學者之行傳及學說，取材則精確精嚴，敘述則詳贍顯豁……現正加工趕印，定一月後出版，不日即將發售貲價，是書編纂者為唐敬杲氏。此外，分任校訂者如李希賢、何崧齡、沈雁冰、周昌壽、陳承澤、范壽康、黃士復、黃訪書、鄭貞文、顧壽白諸氏，亦均富有專門學識，為一時之選，預料出版以後，必能風行一時云。[1]

廣告詞的重點宣傳幾個面向：首先，這是一本乘著新文化運動潮流而生的百科辭書；其次，這本書的編輯和取材幾乎囊括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各種面向。最後，除了主編唐敬杲（1898-1982）之外，負責《新文化辭書》的商務印書館編輯群，都是讀者認識的文化名人。

論者曾經提出百科全書的出現是西學「普及化」的象徵。[2]相較於辭典，百科全書的特性在於其所提供的訊息是關於事物而非詞彙，這是二者本質上的差別。[3]當思想與概念歷經傳統向現代的轉化過程，舊有的知識、觀點體系漸次崩解，新式的思想資源逐漸融入舊有的知識體系當中，該如何整合這些新舊

1　〈新文化出版物〉，《順天時報》，號 7029，1923 年 9 月 30 日，第 7 版。

2　李孝悌，〈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1 本第 3 分（2010 年 9 月），頁 652。

3　見梅嘉樂（Babara Mittler），〈「爲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務印書館及其《新文化辭書》〉，收入陳平原、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主編（下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195-196。

知識，使其可資運用？字典和百科全書在晚清中國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原因在於晚清之際出現爲數眾多的新名詞、學說和概念，[4]字典和百科全書就是對新名詞所帶來的新學說和新概念進行權威的認可，加以「界說」和「辨正」的工具。[5]兩者的性質在於將廣大無垠的資訊轉化爲系統性的知識，提供讀者一個便於查索的方式。[6]然而，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百科全書乃是「排列詞類一定次序，而解釋其意義用法之書籍」，字典則是「逐字解釋」的工具書。[7]浮現於晚清的「新名詞」和「新概念」的討論，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未見停歇。影響所及，就是學術界和出版界熱衷於編纂各種字典和辭書，商務印書館於1923 年出版的《新文化辭書》，一方面見證了「新名詞」和「新術語」層出不窮的現象，[8]另一方面也見證了時人在務求專業知識的情況下，分科化或專業術語的百科辭書如何漸次取代晚清時期以提供廣泛知識爲主的百科全書。[9]

4 譬如彭文祖所著的《盲人瞎馬之新名詞》，雖是一本「報效痛恨」之作，但也間接證明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日文行乎中土」的景況。見張步先，〈序文〉，收入彭文祖，《盲人瞎馬之新名詞》（東京：秀光舍，1915），序頁 2。對於新名詞之解釋、看法和傳布，彭文祖如此道出：「名詞先有新舊之別，然後事物乃有新舊之分。……世只有新事物而無新名詞。……溯我國新名詞之起源，於甲午大創以後，方漸湧於耳鼓。此留學生與所謂新人物如現之大文豪梁啓超等者，共建之一大紀念物也。舊人物見之退避三舍。……辛亥一舉，雖老將軍猶不得遂豫讓之死，勢有不得不屈從之慨。於是乎新名詞彌漫全國，小學蒙童，皆以競談新名詞爲能事，留學生與新人物獨占教壇第一峰。」對於當時出版界競相出版相關書冊，彭文祖如此評論：「騙神與書舖如商務印書館、新學會社等等見新名詞三字有利可圖，遂連篇累冊，詳加臭味解釋，印刷出市。一面博社會之歡迎，一面壟斷其厚利厚臉稱爲著作所有權不准翻印。儼然以新名詞如乃祖乃宗傳授者然。」。見彭文祖，《盲人瞎馬之新名詞》，頁 1-2、4-5。

5 陳平原，〈作爲「文化工程」與「啓蒙生意」的百科全書〉，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3。

6 譬如曾樸和徐念慈編纂的《博物大辭典》的例言中就提到：「我國通行學界者，祗有字典而無辭典，自譯籍風行，始有注意於撰普通辭書，以便讀者諸君之檢查。本書爲教師學生讀書參攷之用。」見曾樸、徐念慈編，《博物大辭典》（上海：宏文館，1907），頁 1。

7 見黃人，〈詞書〉，收入氏編（下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國學扶輪社校印．中國詞典公司，1911），申集，頁 37b。

8 章清，〈晚清中國接納新名詞、新概念遭遇的三重屏障〉，《南國學術》，2015 年第 4 期，頁69。

9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Rudolf G. Wagner,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Rudolf G. Wagner, eds.,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4), pp. 17-19.

作爲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辭典，《新文化辭書》在當時還曾被《京報副刊》的選書者挑爲青年十部必讀書之一，[10]更是第一本號稱蒐羅新文化運動思潮的工具書，足見其重要性所在。

目前學界關於《新文化辭書》的研究成果，大多聚焦於《新文化辭書》乃是匯集新文化運動的成果之作。王飛仙提出《新文化辭書》與商務用人、改版期刊、出版叢書等回應「新文化」的舉措是一致的，《新文化辭書》所呈現的是「簡單易懂實用」且「外來、時髦」的新文化圖像。[11]黃興濤同意王飛仙的論斷，並進一步以《新文化辭書》的詞條內容進行分析，提出《新文化辭書》對於新文化運動後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潮具有引路之功。[12]李歐梵則是從《新文化辭書》編輯團隊的背景和詞條的內容入手，討論《新文化辭書》的思想資源。李歐梵雖未明確指出《新文化辭書》引用的藍本爲何，但透過編輯團隊其他作品的對照，精彩地推測出詞條的內容可能出自於哪位作者之手。[13]梅嘉樂（Babara Mittler）進一步分析《新文化辭書》的內容，利用《新文化辭書》的序言，認爲辭書是爲了一般讀者而作，以分科的形式呈現「實用的」知識，其中以哲學佔據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藝術、社會經濟學、宗教事務、自然科學和古代經典。然而，梅嘉樂進一步提到，《新文化辭書》的詞條所呈現的內容較爲精細，因而所設定的理想讀者應當是對西方文化、語言和事物具有先備知識的讀者，這便表明了《新文化辭書》的預設讀者依舊是當時社會中產階級的一小群人，至少是懂英語的一群讀者。[14]就如同梅嘉樂所云，即便沒有任何資料證明，但可以推斷《新文化辭書》的資料是從既有的材料（部份很可能是外

10 王世家編，《青年必讀書：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二大徵求」資料彙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頁 46。本文原刊於《京報副刊》，1925 年 2 月 28 日。

11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頁 129-130。

12 黃興濤，〈「新文化」的出版姿態、知識構建與社會傳播──1923 年商務版《新文化辭書》的歷史透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 年第 6 期，頁 158-169。

13 李歐梵著，楊明晨譯，〈《新文化辭書》試釋〉，《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總期 1（2019 年夏季號），頁 170-191。

14 Barbara Mittler, “China’s ‘New’ Encyclopaedias and Their Readers,” in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p. 405.

文的）中蒐集整理得來的。[15]實藤惠秀（1896-1985）則將《新文化辭書》歸類爲「採用了日本的譯語」的辭書，且全書所收錄的詞條，大抵只有一半以上的內容是屬於新文化詞彙，每頁皆可見到與日本詞彙相關的詞彙。[16]鍾少華則認爲《新文化辭書》的內容明顯帶有英文翻譯的句法，但並未說明詞條內容採擇的原始出處。[17]這些研究大抵是將《新文化辭書》與新文化運動掛鉤在一起，並沒有詳述《新文化辭書》的思想資源、時代位置和編輯意圖。

由此可見，《新文化辭書》作爲第一部躋身「新文化」行伍[18]的百科辭書，尚有值得研究之處。本文擬從幾個面向進行探究：商務印書館內部的改革計畫與《新文化辭書》的面世、《新文化辭書》編輯團隊的背景爲何？以唐敬杲爲首的編輯團隊是利用何種思想資源進行編纂工作的？與晚清同類型的著作比較，《新文化辭書》內中收錄的詞條呈現出何種樣貌？《新文化辭書》的詞條，提供了什麼樣的思想圖景？這是本文試圖解答的幾項要點。

二、新潮起落之間的編輯團隊

1923 年 10 月，《新文化辭書》以低廉的價格正式出版。[19]當時的幾份報刊對這本著作有些許介紹。《東方雜誌》的記者認爲在《新文化辭書》出版之前，不曾出現學術意義上的百科辭書，對於世界上新興的思潮、主義和學說都

15 梅嘉樂，〈「爲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務印書館及其《新文化辭書》〉，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98。不過，在這篇文章中用以分析音樂相關的八項詞條，梅嘉樂並未指出內容的來源爲何。

16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頁 306。不過，實藤惠秀同樣未指出詞條的來源爲何。

17 鍾少華，〈新文化辭書〉，收入氏編著，《中國近代辭書指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122。

18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Rudolf G Wagner,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in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p. 19.

19 《新文化辭書》在出版時定價四元，特價二元四角。《東方雜誌》的記者提及商務印書館著眼於這部辭書是人人所不可不備之書，因此以低價的策略，希望《新文化辭書》可以普及於社會。見〈介紹『新文化辭書』〉，《東方雜誌》，卷 20 號 24（1923 年 12 月），頁 55。

沒有得到確實的觀念，就連佛教、基督教這樣在中國行之有年的文化權威，關於教派的沿革、組織和教義，皆莫能詳辨。[20]至於《新文化辭書》的編纂主旨，則可從西文書名“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入手，意指該辭書是一部「新學識百科辭書」，對於西洋文化要進行全盤的輸入，對於固有的外來文化也要給予系統的描述。[21]有論者指出，《新文化辭書》是一部「西學」百科全書。這部百科全書蒐羅廣泛，其中「西學」專指外國知識，與中國事務毫無瓜葛。[22]從編纂者唐敬杲自陳的文字來看，這本書唯一的目的「在欲供給我國人以最有用的知識」，在寫作的手法上，則務求「高深學問底通俗化」。[23]書末並附有中西文索引，各種名詞都「朗若列眉，一索即得」。[24]在《新文化辭書》中，對於古今「宏哲碩學」的傳記和思想學派的描寫極爲精細，不僅介紹生平閱歷，還詳加羅列作品出版的年代及其影響。[25]就如同論者所言，《新文化辭書》不是字典，內容是關於事物而非字詞，強調的是人物、思想和宗教流派。[26]

《新文化辭書》編輯團隊的組成，反映出「第二代」（相對於科舉出身的張元濟）商務印書館編輯群的日本知識背景。這本書的主編爲唐敬杲，校定者則是李希賢、何崧齡、沈雁冰（1896-1981）、周昌壽（1888-1950）、陳承澤（1885-1922）、范壽康（1896-1983）、黃士復、黃訪書、鄭貞文（1891-1969）和顧壽白（1893-1982）等人。其中，李希賢、周昌壽、陳承澤和黃士復四人是唐敬杲特別感謝的對象。[27]檢視以唐敬杲爲首的編輯團隊，我們可以獲知這些學人的學思歷程，亦能從中得知這些學人的思想資源從何而來。得力於海德

20 〈介紹『新文化辭書』〉，《東方雜誌》，卷 20 號 24，頁 55。
21 〈新文化辭書〉，《學生雜誌》，卷 11 期 1（1924 年 1 月），頁 215。
22 瓦格納，〈晚清西政與西學百科全書〉，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37。
23 唐敬杲，〈新文化辭書敘言〉，收入氏編纂（下略），《新文化辭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頁 3-4。
24 〈介紹『新文化辭書』〉，《東方雜誌》，卷 20 號 24，頁 55。
25 〈介紹新文化辭書〉，《婦女雜誌》，卷 10 號 1（1924 年 1 月），頁 153。
26 梅嘉樂，〈「爲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務印書館及其《新文化辭書》〉，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98。
27 唐敬杲，〈新文化辭書敘言〉，收入《新文化辭書》，頁 6。

堡大學建置的百科全書資料庫、[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置的「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資料庫和相關研究，我們可以較爲便利查索到《新文化辭書》編輯團隊的資訊。主編唐敬杲在 1915 年入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譯員的工作長達 17 年。公務忙碌之餘，奮力自學日文。沈雁冰在 1916 年入職商務印書館，在張元濟（1867-1959）的安排下先在編譯所英文部工作，1921 年起則肩負改革《小說月報》的重責大任。承擔《新文化辭書》全書校閱工作的李希賢，則是商務印書館的專業辭典編纂者，亦掛名由黃士復領銜的《綜合英漢大辭典》的 12 位編輯者之列。[29]《綜合英漢大辭典》於 1924 年啓動編譯工程，1928 年排印完成，付梓出版。[30]參訂《綜合英漢大辭典》計畫者有王雲五（1888-1979）、江鐵、何崧齡、高夢旦（1870-1936）、陳承澤和黃士復；主任全書編輯者有黃士復和江鐵；分擔編輯者有文元模（1890-1946）、李希賢、吳衡之、周昌壽、林騤、胡嘉詔（1887-1962）、程選公、鄭貞文、謝六逸（1898-1945）、戴鴻儒、羅鼎（1887-1979）和顧壽白等；正編定稿後，又搜集新材料列爲補編，由林騤、陳趾青和顧壽白擔任翻譯，程選公、戴鴻儒和顧壽白擔任修改；復由黃士復和江鐵編訂。[31]

與《新文化辭書》相關的校訂者，幾乎都出現在《綜合英漢大辭典》的編輯名單中。陳承澤（愼侯）曾留學日本攻讀法政和哲學，畢業回國後，受第一任編譯所所長張元濟賞識，招攬至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譯員，[32]致力於國文文法的研究和字典編纂。鄭貞文亦曾留學日本，攻讀理論化學，回國後經陳承澤介

28 http://encyclopedia.uni-hd.de (accessed January 25, 2019). 這個資料庫現在已經停止對外開放，需要申請帳號密碼才能使用。

29 《綜合英漢大辭典》初版於 1928 年，商務印書館於 1936 年將原書的兩冊正、補編合爲一冊，以便檢閱。關於《綜合英漢大辭典》的討論，可參考鄒振環和蔡祝青精要的討論。見鄒振環，〈《綜合英漢大辭典》的編纂、特色與影響〉，《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2 期，頁 58-59。蔡祝青，〈從民初漢英辭典的編纂到百科名彙的確立：以「文學」詞條的發展爲例〉，「英華字典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年 8 月 24-25 日。

30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 235。

31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244。

32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99。

紹進館，擔任編譯員和理化部主任。[33]日本留學期間，鄭貞文與周昌壽、羅鼎等人曾參考多部英、日文辭典，編成一部《綜合英漢大辭典》，後經黃士復和江鐵修訂，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周昌壽負笈日本攻讀物理學，曾在日本留學達 13 年之久。周昌壽與鄭貞文同為中華學藝社成員，1920 年中華學藝社出版的《學藝雜誌》由商務接手出版，周昌壽由日本返回中國加入編譯所行列，[34]致力於物理學著作的編譯工作。何崧齡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回國後供職於商務印書館法制經濟部，亦曾編有《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范壽康留學日本攻讀哲學，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輯，以哲學為主題的著述甚多。顧壽白東渡日本習醫，自長崎醫科大學畢業後，返國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醫學組主任。黃訪書則在 1915 年進入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譯所英文部編輯。[35]

從這些編輯者的求學過程來看，我們大致可以推估出《新文化辭書》的編輯群大多數擁有留學日本的經驗，其中幾位編輯如黃士復和鄭貞文，此後仍繼續有編纂辭典的經驗。鄭貞文、陳承澤和周昌壽是以留日學生身分供職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沈雁冰則是北大畢業的學生。[36]整部《新文化辭書》包羅萬象的內容，關於自然科學的部分應是出自周昌壽、鄭貞文和顧壽白之手，或是由這三位知識人擔任編輯顧問。《新文化辭書》雖是由唐敬杲掛名主編，但就如同唐敬杲所云：「每一條項，易稿至三四次；稿成之後，又懇請學有專長的諸位先生，加以考訂。」[37]從《新文化辭書》的編輯團隊來看，這群早年留學日本的學人，在 1910 年代中期回國入職商務印書館時，身懷的東瀛「新學」即將面臨歐美歸國學人的挑戰，適值一個尷尬的位置。相較於晚清接觸西學的學人，留日學生可稱之為「新學者」；然而，面對新文化運動之後直接輸入的歐

33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 100。

34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 110。

35　張謝、戢煥奇，〈商務印書館早期英文部編輯成員述評〉，Proceedings of 2017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form and Modern Management, 泰國：ERMM，2017 年 8 月 6-7 日，頁 344-345。

36　余連祥，〈商務印書館的用人機制與茅盾的成名之路〉，《湖州師範學院學報》，2016 年第 11 期，頁 45。

37　唐敬杲，〈新文化辭書敘言〉，收入《新文化辭書》，頁 5。

美思潮，他們反倒成爲舊的「新學者」。不到十年的時間，思潮起落之間，已經從轉手東瀛學問到直面歐美思潮。《新文化辭書》的編輯團隊已然成爲上一批的「新學者」，處於追趕潮流，而非創造潮流的位置。

三、商務印書館的改革與王雲五的到任

1921 年 9 月 16 日，自學成材的王雲五通過商務印書館的門檻，成爲編譯所的一員，在經過兩個月的試用期後，正式被聘任爲編譯所所長，開始了大半生與商務印書館的不解之緣。王雲五是編譯所的第三任所長，前兩任所長分別爲張元濟和高夢旦。[38]王雲五是受胡適（1891-1962）的推薦入館。彼時的商務印書館正面臨內外兩股壓力，內部的壓力在於人才的換血，自首任所長張元濟起就迭有汰換人才的呼籲，只是在商務印書館內部的壓力和考量之下，窒礙難行。外面的壓力來自於五四運動之後來勢洶洶的新文化運動，正如瞿秋白（1899-1935）所言，在五四運動之後，出現一股新思潮怦然勃發的態勢。瞿秋白認爲五四運動最初雖由山東問題的外交恥辱所引發，但實則爲一種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北至北京，東至上海，西至成都，南至廣州，都出現許多出版物和集會，見證新文化運動所支配的現象。[39]胡適在 1922 年也有這樣的說法：

> 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這是一大關係；況且「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們對於新潮流，或採取歡迎的態度，或採取研究的態度，或採取容忍的態度，漸漸的把

38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112。

39 瞿秋白，〈革新的時機到了！〉，《新社會》，號 3（1919 年 11 月），第 2 版。當時的人還曾以「思想革新」和「社會改造」爲準則，介紹當時出版以「新文化」爲宗旨的叢書和期刊。見卞鴻儒，〈介紹新文化運動底出版物〉，《瀋陽高等師範週刊》，號 23（1920 年 11 月），頁 16-22。

> 從前那種仇視的態度減少了，文學革命的運動因此得自由發展，這也是一大關係。[40]

自晚清以來，商務印書館以編印教科書逐漸在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但對於當時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思潮並未多所措意，因而造成銷售業績下滑。[41]1919 年 4 月 1 日，羅家倫在《新潮》上發表〈今日中國之雜誌界〉，猛烈批評商務出版的《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和《婦女雜誌》，認爲這三種雜誌是屬於「腦筋渾沌」的學理派雜誌。[42]商務印書館的管理階層才驚覺事態的嚴重性，羅家倫的批評成爲商務印書館在五四之後推動改革的契機。[43]根據沈雁冰的回憶，商務印書館管理階層最初對於五四運動並沒有特別注意，只將之視爲政治事件，與文化無所關涉。[44]承載五四運動之勢而來的新文化運動衝擊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並促使商務調整出版方針，回應民間對新文化和新知識的訴求。這股「新文化」的潮流，不僅展現在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方向，更展現在內部用人唯才的政策轉變。[45]在內外兩股壓力的夾擊下，高夢旦找來北方知識界的領銜人物胡適，希望胡適可以擔任編譯所所長。胡適起先礙於高夢旦的邀請，無法推託，幾經思忖之後，仍決定返回北京大學教書。胡適替商務印書館物色的接任對象就是王雲五。在胡適的背書下，王雲五先是提出一道改革編譯所的意見書，得到前後任所長張元濟和高夢旦的支持，就此開始在編譯所 25 年的生涯。[46]

40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 2，頁 339。

41　這項危機起源於 1912 年中華書局掛牌營業，推出反映共和思想的《中華教科書》，形成商務「最新」系列教科書的強勁對手。見柳和城，《挑戰和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 10。

42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卷 1 號 4（1919 年 4 月），頁 626-627。

43　柳和城，《挑戰和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頁 35。

44　茅盾，〈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後〉，《茅盾全集第 35 卷．回憶錄一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頁 187。

45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 40-41、140。

46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113-114。

王雲五在編譯所初試啼聲的第一件事，就是實施整頓和編輯計畫。王雲五將編譯所下分支的各部門重新組織，各自找來學有專精的學者執掌各部，並且增加編輯的人才。在出版品方面，王雲五入職商務印書館的時間，適逢商務印書館回應「新文化」調整出版方針之際，王雲五將過去商務印書館集中出版教科書的策略，轉換成出版符應新時代新知識的現代叢書。在王雲五的規劃下，商務印書館推出《百科小叢書》、《新時代史地叢書》和《國學小叢書》等。[47]不過，本文所討論的《新文化辭書》並沒有出現在王雲五的記述之中。筆者寓目所及，與商務印書館相關的回憶文章和二手研究，亦無《新文化辭書》的記載，但《新文化辭書》確實是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品，在 1925 年一份商務印書館出版品書目中，的確有《新文化辭書》一項。[48]雖然我們無法得知《新文化辭書》在當時商務印書館內部的情況，仍可以從三個面向推論這本辭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理由。

首先，《新文化辭書》出版的 1923 年，正是王雲五到任的第二年，商務印書館若想回應外在「新文化」思潮的衝擊，出版一本百科全書式辭書，正是時機恰當。王雲五在青年時曾從頭到尾自學讀完一部大英百科全書，[49]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後，隨即啓動《教育大辭書》[50]和全套 9 冊《少年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51]顯示王雲五對於百科全書和專門辭書的編纂是極有興趣的，況且讀者閱讀這些叢書和百科全書，也需要一本工具書來對讀書中的專有名詞，《新文化辭書》適好扮演這個角色。

第二，列名《新文化辭書》校對者的茅盾，在進入商務印書館英文部後曾對《辭源》提出批評，認為《辭源》所收的新詞太少，特別是關於政治、經濟和科學這三方面的新詞，且《辭源》版權頁上英譯為「百科辭典」，是名實不符之處。茅盾的信件轉交到商務印書館的辭典部後，再被往上送呈給當時編譯

47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119-120。
48 商務印書館編，《新文化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頁 33。
49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113。
50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120。
51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143。

所主任高夢旦，高夢旦爲此召見茅盾。茅盾的批評引起商務印書館同人和主管極大的注意，是茅盾意想不到之事。[52]從《辭源》出版的 1915 年以迄《新文化辭書》出版的 1923 年，商務印書館在這八年當中，沒有出版任何一本百科全書式的辭典。唐敬杲領銜編纂的《新文化辭書》，亦可說是回應茅盾當年批評的一項成果。

最後，從營利維生的角度而言，商務印書館與其競爭對手中華書局，在回應新文化運動的面向，互不相讓。商務印書館在 1920 年開始與歐遊歸國的梁啓超策劃「共學社叢書」，翻譯西方的各色思想，分成時代、教育、經濟、通俗、文學、科學、哲學、哲人傳記、史學和俄羅斯文學等十類，出版專書不下百餘種。[53]中華書局則在 1919 年成立「新思潮社」（後來轉爲新書部），準備系統翻譯出版外國書籍，1920 年更找來少年中國學會的左舜生（1893-1969）擔任編輯所的新書部主任，規劃「少年中國學會叢書」和「新文化叢書」。從 1920 年開始，這套以「介紹世界最新的哲學、政治、經濟、社會等學說」，目的在於「開社會風氣」的叢書陸續出版。[54]商務印書館在「共學社叢書」出版之後，又陸續規劃「學藝叢書」、「新時代叢書」和「文學研究會叢書」，其中「學藝叢書」的核心成員鄭貞文、陳承澤、周昌壽、范壽康和何崧齡等人同爲《新文化辭書》的編輯群。[55]由此可見，《新文化辭書》誕生於商務印書館內部的編輯需求，更重要的是誕生於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雙方爭奪「新文化」的生意經這層面向。

四、超越詞典的百科全書：《新文化辭書》的內容體裁

或許讀者會質問，「新名詞」的出現已然是清末開始的現象，那《新文化辭書》的時代特色爲何？關於這點，可與「新名詞」釋義的代表作《普通百科

52 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茅盾全集第 35 卷．回憶錄一集》，頁 136-137。
53 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 139-144。
54 周其厚，《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38、172-173。
55 柳和城，《挑戰和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頁 86-88。

新大辭典》進行比較。1911 年，黃人（1866-1913）[56]編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由上海國學扶輪社出版，辭典在五月初版，六月旋即再版，七月便已三版，每版印數 3,000 冊，可見其受歡迎程度。[57]在 1931 年的《申報》上仍可見到《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銷售廣告，並且維持二十年前出版時的半價銷售策略。[58]黃人在凡例中提到：「吾國新名詞大半由日本過渡輸入」，且「文科上普通之新名詞，用者每多泛濫，特一一詳定界說」，[59]由此可見「新名詞」是這本辭典著重措意之處。至於《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之名，可能來自留日學生范迪吉於 1903 年主持編譯的《普通百科全書》的靈感。《普通百科全書》是晚清最早被冠以「百科全書」之名出版的套書。《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編輯形式不似一般以字詞解釋爲主的字典，而近於《新文化辭書》以專有名詞的釋義出處爲主的百科辭典。[60]所謂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就是將「普通百科」所涉及的各專有名詞，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並且說明解釋其意義用法的書籍，尚稱不上是現代的百科全書，而是具有百科視野的大詞典或是百科性詞典。[61]本節即欲藉由對比的方式，檢視在出版年代上相距十餘年的兩種百科辭典，在詞條收錄、印刷形式和預設讀者的差別。

根據現有的研究指出，黃人編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是晚清百科全書中最爲成功的一部。[62]書前除了黃人的序言外，還有嚴復（1854-1921）手書的

---

56 關於黃人的生平資料，可見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57 見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1911）〉，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50。陳平原，〈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爲中心〉，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60-161。

58 〈廣告：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申報》，1931 年 4 月 8 日，第 13 版。廣告中的文字是：「全書十五厚冊，分兩錦函，定價八元，特價四元四角。」

59 黃人，〈凡例〉，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1。

60 就如同黃人的序言所云：「吾國之僅有字書、類書，而無正當用詞之專書也。彼歐美諸國，則皆有所謂詞典者。名物象數，或立界說，齊一遵用，嚴於律令。非如字書之簡單而游移，類書之淆雜而滅裂。」見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序〉，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1b。

61 陳平原，〈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爲中心〉，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60-161。

62 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1911）〉，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40。

序言一篇。從內容的編排上來看，《普通百科新大辭典》計兩函 15 冊，每冊約莫有 100 頁左右。總目一冊，以字首筆畫爲序；分目一冊，以學科分類；補遺一冊，其餘 12 冊由子集至亥集排列。[63]在翻譯的詞彙上，是以學部部定的名詞爲參考標準，其餘則採取通行最廣的詞彙。全書收羅 1,1856 項詞條，分爲「政治」、「教育」、「格致」和「實業」四大類，又進一步分爲 53 個學科和 14 個次級學科，每項詞條底下以略字標明所屬學科。在這些學科當中，以自然科學所佔的比例較高。根據統計，屬於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詞條約佔 5,500 條，其餘皆是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知識。[64]黃人在編輯時特別看重外國知識的詞條，在編輯凡例中提醒讀者注意，凡是非本國歷史、地理和文學三者，會在詞條底下的略字之上加有○符號。[65]顯示黃人認爲中西有別的科目在歷史、地理和文學三者，其他的學科，如植物學、地質學或化學一類，則是具有放諸四海皆準、世界通行之規則。

檢視整部《新文化辭書》所收錄的 759 個詞條，約莫有五分之三的篇幅是以人物介紹爲主，剩下的篇幅則環繞著專有名詞、學說和思潮而生。時人對於《新文化辭書》的內容編排，大多評價爲「取材異常精審，敘述異常詳盡」。[66]唯一的例外是一位署名「林斯德」的作者，爲了編列一份中文參考書籍的解題書目，對一眾《新文化辭書》的溢美之詞，提出不同的聲音。林斯德將其蒐集到的中文參考書目分爲九大類別，《新文化辭書》被歸爲首項的哲學類。林斯德認爲《新文化辭書》對於政治、宗教、經濟、法律、社會、哲學、文藝、美術、心理、倫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學與新文化有關之知識、傳記和學說，皆有所蒐羅，但其解釋「偏于哲理方面爲多」。對於編纂的方式，則批評其：「各

63 周振鶴，〈黃人所著之《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隨無涯之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頁 221。

64 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1911）〉、陳平原，〈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爲中心〉，以上均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44、168-169。

65 黃人，〈凡例〉，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2a。

66 〈新文化辭書〉，《學生雜誌》，卷 11 期 1，頁 215。

條注釋每有超出一二萬字以上，似嫌拖沓，使讀者不易得其意之所在。」[67]的確，檢視《新文化辭書》中收錄的詞條，詞條內容的詳略不一，譬如說「佛教」一條高達六十幾頁，[68]亦有如「現實哲學」一條，僅有不到一頁之篇幅。[69]

從內容的編排來看，《新文化辭書》正文有 1,107 頁，詞條是以英文字母的順序進行編排，每項詞條先以原文呈現，繼而是譯名，再接續是詞條的內容，書末則附有中西文索引。與清末的辭典以直行排列相較，五四以後出版的《新文化辭書》是以橫行排印。[70]這樣的編排方式，使《新文化辭書》看起來是一部具備「現代」意義的百科辭書。[71]如同上文所云，《新文化辭書》出版之初以低價策略鼓勵讀者購買，隔年旋即三版，出版四年後仍繼續再版。1931 和 1934 年的《申報》上仍有《新文化辭書》的重版廣告，[72]顯見《新文化辭書》出版十年後仍有其銷售市場。根據論者所云，《新文化辭書》的銷售榮景得力於 1907 年《大英百科全書》在中國的失利，這爲《新文化辭書》創造出銷售的空間。如同《大英百科全書》，《新文化辭書》書中所傳遞的關於西方的新詞彙與新知識，挑戰了既有知識秩序的矛盾和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新文化辭書》按照字母次序編排的形式，就如同一部中國版的《大英百科全書》，迎合了當時讀者熱切追求西方事物的脾胃。[73]

《新文化辭書》中關於「新名詞」的詞條，已歷經新文化運動的汰洗，並非清末的原貌。在《新文化辭書》的各種詞條中，人名的部分有 78 項可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中尋得；以專有名詞而論，則有 50 項條目可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中覓得。以詞條的重複度而言，並不算太高。從內容上來看，《普

67 林斯德，〈中文字典辭書解題〉，《圖書展望》，期 3（1935 年 12 月），頁 39。
68 唐敬杲，〈佛教〉，收入《新文化辭書》，頁 82-145。
69 唐敬杲，〈現實哲學〉，收入《新文化辭書》，頁 4-5。
70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 306。
71 Barbara Mittler, "China's 'New' Encyclopaedias and Their Readers," in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p. 405.
72 〈五大辭典．重版出書〉，《申報》，1931 年 6 月 12 日，第 1 版。〈商務印書館本週重版書〉，《申報》，1934 年 8 月 25 日，第 4 版。
73 Barbara Mittler, "China's 'New' Encyclopaedias and Their Readers," in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p. 422.

通百科新大辭典》的介紹簡要，大多是以幾句話帶出詞條的精義，《新文化辭書》則是以詳細見長。透過這 128 項詞條的對照，我們大致可以知道《新文化辭書》並無延續《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知識構成和詞條內容。唯二在內容上較爲相近的詞條是「浪漫主義」（Romanticism）和「達爾文進化論」（Darwinism）這兩項，也是《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中內容稍長的兩條。《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是以音譯法將現今翻譯爲「浪漫主義」的詞條「羅馬第昔斯姆」：

>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風行於全歐洲精神之文藝上新風潮，十八世紀盛行擬古文學，恪守希臘羅馬典籍之規律，拘攣天才，感情與知識，皆不能發達，於是但摭拾而無意想，久而反動，排斥一切傳習之陳言，而大奮其天然高遠之理想，破成格而求實際，以形式操縱自由，及釋放個人感情為根本主義，遂成一種前無古人之新文藝。（如索克司比亞之喜劇向所奉為金科玉律者亦為積薪）此對於常識文藝，稱為情感文藝，又對於執實文藝，謂之靈空文藝。[74]

「浪漫主義」在《新文化辭書》當中的開頭，如此道出：

> 這種主義是以萌芽於十八世紀末而極盛於十九世紀初期底文藝為中心的思想傾向。自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期，歐洲文藝界起了一個很大的衝突，就是古典主義（Classicism）和浪漫主義的衝突。十八世紀的中葉，那擬古主義的思潮和格調已經達於極點，法國固不消說了，其餘如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只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國家，沒有一處的文藝，不是摹擬那由文藝復興期繼承下來的古典，弄得情熱都被禮法壓抑，靈活都被典雅禁住，帶有台閣的風氣，缺乏自然的清新，到了後來，遂把人類豐富的感情，都埋沒得乾乾淨淨了。但是人類本來的個人精神，對於這種思想的束縛，文辭的乾澀，早就不滿足的了，所以各國文學界才發生這個浪漫主義出來。[75]

74　黃人，〈羅馬第昔斯姆〉，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亥集，頁 17b-18a。
75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823-824。

與《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相比，《新文化辭書》在內容上增添了歐洲各國浪漫主義運動的樣貌。至若「達爾文進化論」一條，《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是這樣說的：

> 達爾文闡明生物進化原理之學說，其大旨，謂凡生物者，因某原因而起特殊之變化，不獨遺傳於子孫，且累積年月，漸漸增其變化之度，其變化亦無一定方向，但競爭生存，而為最宜之變化者，則蕃殖而至於成一新種，反之，不適於生活上之變化者，則全不能生存，而至絕滅，今日世界所存之生物，皆自然淘汰之結果，為適宜於生活之變化，而留傳者也，要之凡種類之成形而存世者，皆由自然淘汰與漸次變化而來也。[76]

《新文化辭書》的「達爾文底進化論」開頭的內容：

> 凡提及進化論的人，一定聯想到達爾文；提及達爾文的人，也一定聯想到進化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不惟變更歷來的生物學和哲學的思想，就是其他一切社會的思想，也可以說是從根本上推翻了（參看進化論）。達爾文以爲進化有種種原因；自然淘汰而外，還有所謂雌雄淘汰，人爲淘汰。如今且把這些學說的大要，紹介於下：（一）自然淘汰說（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此說創自達爾文，他用來解釋生物底進化，並且說生物底分化，也都由於自然淘汰生出來的。斯賓塞（Spencer）之所謂「適者生存」，也就是指這個而言。這兩者都是說生物底各種官能，如何如何的適合於其生存條件的。[77]

除了詞條解釋的粗略精細之外，《新文化辭書》也呈現了幾方面的質變，反映 1910 年代末期的新發展，並非單純延續清末的「新名詞熱」。第一，《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對於專有名詞的翻譯仍存有音譯法的現象，在《新文化辭書》中幾乎不復存在。第二，以上文出現的「古典主義」爲例，《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將之音譯爲「克拉西斯姆」，不過在正文中則有：「譯作尙古主義、擬古

[76] 黃人，〈達爾文進化說〉，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酉集，頁 11a-11b。
[77]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228。

主義、古典主義等。」[78]這顯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恰恰處在詞彙翻譯混融（hybridity）的階段，黃人並非不知曉「古典主義」的用法，但仍以音譯法展現條目，體現當時的一種觀念，即認爲音譯法才是與「英語」世界接軌的形式。[79]至若嚴復的譯法，如「計學」一詞，則仍保留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詞條中。[80]在黃人的序言中，同樣也出現嚴復翻譯的「天演」一詞。[81]第三，如同論者所言，《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用字是簡潔典雅的文言體，就如同黃人現身面對讀者進行說教一般，[82]而《新文化辭書》的表述方式則是敘事性的白話文體。

除此之外，兩者還有些許異同之處。從印刷形式上來看，《新文化辭書》和《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詞條前面皆附有原文，但《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是以筆劃多寡作爲詞條的次序且採直書印刷；《新文化辭書》是以英文字母的排列方式和橫書印刷。《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採取的是古籍裝幀的書頁，《新文化辭書》則是以連續不斷的阿拉伯數字作爲頁碼。兩者皆是以引介新知作爲辭書的核心概念，《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中關於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詞條僅佔極少比例，絕大部分的篇幅都讓位於古希臘哲學的介紹。

---

78 黃人，〈克拉西斯姆〉，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卯集，頁 2a-2b。

79 此處感謝審查人的提點。誠如學者所言，翻譯的過程歷經三個階段：模仿、適應與論述整合。所謂的模仿階段，就是當一個概念或詞彙輸入另一個脈絡時，新環境尚無加諸於這個概念或詞彙任何新的評論。音譯法就體現了翻譯的模仿過程。見 J. Leonhard,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Transla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Dimension,”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tander: Cantabria University Press/McGraw-Hill Interamericana de España, 2011), pp. 252-257.

80 黃人，〈社會主義〉，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辰集，頁 34b-35a。詞條的內容是：「今之計學上，組織私有財產制度，與自由競爭制並行，以致生貧富之懸隔，持社會主義者，欲破壞此制度之根本——廢資本家之組織，人各就其相當之勞力而得報酬，所謂平等主義，而即我國均產並耕之說也。」

81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序〉，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1b。

82 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1911）〉，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47。

《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全書組成的部分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學、現代西方醫學和藥理學、教育、中國和歐洲的音樂、藝術、歷史以及歷史人物等等。[83]《新文化辭書》則是一部與中國事物無關的「西學」百科辭書。比較特別的是，黃人會在有些詞條中進行中西的比較，比如說「一元論」的內容，黃人最後總結時提及：「我國儒家之建『元』、道家之『自然』與『一』，而釋氏之『眞如』，皆一元論也。」[84]或者黃人也會現身說法，比如「迭更司」一條，就出現：「我國林紓，曾譯出其《塊肉餘生述》、《滑稽外史》、《孝女耐兒傳》、《賊史》等。」[85]這與《新文化辭書》全然以第三人稱的行文方式，也有所不同。

《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和《新文化辭書》都未告知讀者詞條的來源和參考書目，只知道是從廣袤無垠的書籍中採擇而出的資料。[86]就如同黃人所云：「本書雖供普通之用，而調查各種專門書籍有千餘種之多。挈壺滄海，操斤鄧林，勺水片材，不敢苟也。」[87]兩者皆是以傳遞和增加讀者新知爲目的，都強調辭書的便利性。《新文化辭書》是要讓讀者「以最小量的勞力，獲得最大量的效率」，[88]《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則是以「條分縷析，提要鉤元，絕無晦塞支蔓之弊，……觸類旁通，可省腦力而增新知」，[89]「雖卷帙浩繁而極易檢查，絕不耗費腦力」。[90]

在內容方面，《新文化辭書》分類上省略「歷史」這項範疇，獨缺「歷史」的新文化。因爲缺少堅實的證據，只能推估可能涉及清末學科體制轉型和新文化運動後繼之而起的「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對「歷史」的性質和看法產生

83 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1911）〉，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43。
84 黃人，〈一元論〉，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子集，頁 1a。
85 黃人，〈迭更司〉，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巳集，頁 44b。
86 陳力衛教授已經敏銳地比對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詞條來源之一，是 1908 年由富山房出版的《國民百科辭典》。見陳力衛，〈《普通百科新大辭典》（1911）與新詞新概念〉，「歷史記憶與概念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19 年 10 月 4-5 日。
87 黃人，〈凡例〉，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2b。
88 唐敬杲，〈新文化辭書敘言〉，收入《新文化辭書》，頁 4。
89 黃人，〈凡例〉，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1a。
90 黃人，〈本書之特色〉，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1a。

改變的緣故。《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雖然收有「歷史」分類的詞條，但黃人認爲「歷史」本是中國傳統的學問，在傳統的類書中俯拾即是，要逐一羅列恐怕是「河頭賣水」之舉，所以對於「歷史」相關詞條的選擇，是以「僅采大綱，家派源流，同條共貫，不一一另立」的方式，希望讀者不會認爲其有「愛野鶩而厭家雞」之心態。[91]

最後，則是涉及《新文化辭書》和《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編者和讀者的問題。如同上文所云，《新文化辭書》是以唐敬杲爲首的編輯團隊完成的作品。《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同樣是出於黃人召集一批人馬完成的工作，在黃人的序言中是以「招馬鄭之彥」形容這批編輯班底，且僅花費一年的時間就編制完成，「一更裘葛，成書一百數十萬言」。[92]黃人的編纂工作起於沈粹芬的約稿，沈粹芬本來是商務印書館的一員，得知商務印書館編輯《辭源》的商機，自己便在外開設「國學扶輪社」，請來黃人編輯類似的辭書。黃人實際上同時間編纂了兩部辭書，第一部辭書是傳統的字書《文科大詞典》，於 1911 年 4 月面世。《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則在幾個月後繼之出版。[93]在一年的時間內，黃人連續出版兩本鴻篇巨製的詞典，無怪乎「樂爲應運之先導，自居篝火鳴狐」，得意洋洋之情溢於言表。[94]至於讀者的部分，《新文化辭書》設定的是對西方文化、語言和事物具有先備知識的「一般民眾」，是爲了提供系統的知識而非「解釋疑惑，臨時檢查參考之用」。[95]《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設定方向則是以「教員考檢，學子自修」爲宗旨，一本《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可抵數十種普通教科書的內容，預設的讀者則是「大致合於中學程度」的讀者和「稍通文義者」。[96]

91　黃人，〈凡例〉，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1b-2a。
92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序〉，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2a。
93　汪家熔，《中國近現代出版家列傳：張元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頁 137。
94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序〉，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2b。
95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2。
96　黃人，〈凡例〉、〈本書之特色〉，收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 1a、2a。

五、《新文化辭書》的詞條與日本的思想資源

作爲一部應付「現代時潮」的百科全書，[97]《新文化辭書》被認爲是網羅各方面切要的知識，進行有條理組織介紹的書籍，是一部將「西洋文化爲整部的輸入」之書。[98]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脈絡中，「百科全書」不僅帶來嶄新的知識構成形式與嶄新的知識編排類型，就連「百科全書」一詞都是屬於新名詞。[99] 1907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本名爲《大英百科全書評論》的小冊子，嚴復在一篇同名文章中提出「百科全書者，西文曰嬰塞骨羅辟底亞，正譯當曰智環，或云學郛」，將百科全書翻譯爲「智環」或「學郛」。[100]嚴復繼而介紹歐洲百科全書的來歷，「歐洲智環之作，見於十八世紀中葉，爲當時民智之產子」。[101] 李石曾（1881-1973）是最早進行世界百科全書編纂研究的學者，在清末曾經介紹狄德羅及其主編的《百科全書》到中國。關於百科全書的名稱，李石曾將 encyclopedia 首譯爲「百科類典」，後來因爲受到《四庫全書》命名的影響，又改譯爲「百科全書」。但「百科」一詞容易在學科體制底下混淆，「全書」一詞在漢語中又容易與《四庫全書》這類叢書相混，用來表示 encyclopedia 都不夠適當。李石曾選擇改譯爲「學典」。現在通行的「百科全書」譯名，乃是經由日本傳入的新名詞。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翻譯了各式各樣的百科全書，留日學生浸潤在這股百科全書的編譯風潮中，當他們要著手翻譯漢語版的百科全書時，便是以日本的百科全書作爲參考藍本，自然而然地就選擇了「百科全書」

---

97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2。

98 〈介紹新文化辭書〉，《小說月報》，卷 14 號 12（1923 年 12 月），頁 2。

99 在莫安仁編纂的新名詞辭典最後一部分的補充字彙中，就有「百科辭書」（Encyclopedia）。見 Evan Morgan, *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13), p. 288.

100 嚴復，〈大英百科全書評論〉，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大英百科全書評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頁 1a。

101 嚴復，〈大英百科全書評論〉，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大英百科全書評論》，頁 1b。

作爲 encyclopedia 的譯名。[102]

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在知識層面涵攝政治體制、法律制度、經濟知識與西方科學技術等面向，較傳統類書更爲寬廣。如同梅嘉樂所云，如果我們要研究百科全書的話，找尋到文化內部和國外的來源和出處的資料，是極爲重要的面向。如此一來，我們才得以理解百科全書的功用和讀者的身分。[103]倘若《新文化辭書》如同唐敬杲夫子自譽的一樣，是一部在內容上力求網羅各方面具有系統的知識，在體裁上則是以扼要精善的形式呈現，要作爲知識飢荒中「差可滿意的救濟品」的話，[104]那麼，透過檢視《新文化辭書》的詞條，我們可以得知編輯群參考的思想資源。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無法窮盡《新文化辭書》所有詞條來源，在於《新文化辭書》並未羅列參考書目，無從一一比對。[105]

本文發現《新文化辭書》的詞條來源至少來自兩本當時的日本辭書：《日本百科大辭典》和《哲學大辭書》。由於《新文化辭書》蒐羅的詞條艱深罕見者不在少數，本文將選取幾項最具說明意義的詞條，進行對照的工作。先從《日本百科大辭典》一書的詞條對照開始。在《新文化辭書》中有「啓蒙哲學」這項詞條，全文徵引如下：

102 石川禎浩，〈近代日中の翻訳百科事典について〉，收入石川禎浩、狹間直樹編，《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訳概念の展開》（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3），頁 286。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頁 18-20。鄒振環曾經極爲詳細地梳理了近代中國百科全書的發展源流，極具參考價值。見鄒振環，〈訳語「百科全書」成立、変異及び文化理解〉，《第四回漢字文化圈近代語研究會予稿集》（大阪：關西大學，2004），頁 61-76。

103 梅嘉樂，〈「爲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務印書館及其《新文化辭書》〉，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198。

104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2。

105 就如同當時的書評者評論唐敬杲在 1933 年編輯出版的《現代外國人名辭典》所云：「這本書不同，顯而易見它是根據了一種或幾種的外籍編譯而成的，又加以是初步的嘗試，那參考的書目卻不能沒有，至少也應該把借重的資料在引文裏敘一個明白。現在這些都沒有，於是便有人疑心到它是從日文本譯出來的，或至少是就日本現存的作品，改頭換面而成……一定有外國的比較現存的同類的作品，可以利用。這些作品，總該臚舉出來。」由此可見，缺乏引用書目的來歷，一直是時人和後世研究者困擾的問題。見署名「夔齋」，〈評《現代外國人名辭典》〉，《華年》，卷 2 期 45（1933 年 11 月），頁 895。

Illumination，Enlightenment（英）；Lihrepensée，Émancipation intellectuelle（法）；Aufklärung（德）〔啟蒙哲學〕

所謂「啟蒙」，是一掃傳來的迷信，使人們的思想自由之義。哲學史上，對於十八世紀支配英，德，法思想界的學風特稱之爲啟蒙哲學，並稱那個時代爲啟蒙時代。蓋當時哲學一般的傾向，在解釋高遠幽玄的哲理，使之平易明瞭，並使其和一般的教化融和；打破一切傳襲的偏見，專致力於人文底開發和普及。故，在人文史上，雖有重大的意義；但對於哲學思想底進步，其價值却不甚大，不過在十七世紀的大系統和十九世紀的新系統間，劃一過渡期罷了。表現於這種時代的種種學說，大概受了陸克（Locke）的經驗說和來布尼疵（Leibnitz）通俗的著述底影響，其主要的特徵：（一）經驗的，唯物的，合理的傾向甚爲顯著——以爲如果不得自己理性底承認，就是無論什麼事都不能相信，故其排斥一切傳來的權威，而重自由考察底個人主義的傾向亦顯著；（二）宗教上底議論，自然宗教或理性宗教的主張極盛；（三）倫理上傾於功利說等。在德意志有華爾夫（Wolf），孟特爾遜（Mendelssohn），來馬爾斯（Reimarus），列辛（Lessing），在英國有哈白德（Herbert），多蘭（Toland）一派的自由思想家，在法蘭西有福祿特爾（Voltaire），孔提約克（Condillac），提特羅（Diderot）等爲其主要代表。又在希臘詭辯學者（Sophists）輩出時代，也有稱爲「希臘啟蒙時代」的。蓋以希臘詭辯派的運動，在普及當代之學術思想，從根本上傾覆傳來的迷想之點，和十八世紀底啟蒙時代，也有同一的傾向。[106]

筆者發現，關於「啓蒙哲學」的敘述，《新文化辭書》完全襲自大隈重信（1838-1922）領銜編修，由三省堂出版的《日本百科大辭典》。在該辭典第3卷中，有「啓蒙哲學」、「啓蒙時代」和「啓蒙教徒」等三個詞條。其中，「啓蒙哲學」的敘述，與《新文化辭書》完全一致：

---

[106]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456-457。Lihrepensée 應爲 libre pensée（自由思想）之誤。

傳來の啟蒙を一掃して人間の思想を自由ならしむろ義にて、哲學史上西紀第十八世紀に於て、英獨佛の思想界を支配せし學風を特に哲蒙哲學といひ、其時代を哲蒙時代といふ。蓋し當時の哲學一般の傾向は、高遠幽玄の哲理を解して平易明瞭ならしめ、且これを一般の教化と融和し一切傳襲の偏見を打破して、專ら人文の開發普及に力を致したればなり。從て人文史上には重大なる意義を有すれど、哲學的思想の進步に對しては、其價值さまで大ならす、寧ろ十七世紀の大系統と將に來るべき十九世紀の新系統との間に過渡期を劃するに過ぎず。此時代に表はれたる種々の學說は、主としてロック（Locke）の經驗說及ライブニッツ（Leibnitz）の通俗的著述の影響を受け、其の主要なる特徵は、（一）經驗的・唯物的・合理的傾向著しく、自己の理性の承認を得るにあらずんば何事をも信ずること能はずとせしこと、從て一切傳來の權威を排斥して自由考察を重んずる個人主義の傾向著しかりしこと、（二）宗教上の論議に於て、自然宗教又は理性教の主張盛なりしこと、（三）倫理上に於て功利說に傾きしこと等にして、ドイツにてはヴォルフ（Wolf）・メンデルスゾーン（Mendelssohn）・ライマルス（Reimarus）・レッシング（Lessing）、イギリスにてはハーバート（Herbert）・トーランド（Toland）一派の自由思想家、フランスにてはヴォルテール（Voltaire）・コンヂャック（Condillac）・ヂデロー（Diderot）等を其の主なる代表者となる、又ギリシアに於て詭辯學者（Sophists）の輩出せし時代をギリシア啟蒙時代と稱することあり。蓋しギリシアの詭辯派運動も、亦當代の學術思想を普及して傳來の迷想を根底より轉覆せし點に於て、十八世紀の啟蒙時代と同一の傾向を帶びたればなり。[107]

[107] 大隈重信等編修，《日本百科大辭典》（東京：三省堂，明治 43〔1910〕年），卷 3，頁 1146。這本辭典首卷出版於 1908 年，全部共計 10 卷，由 1908 年陸續出版至 1919 年爲止。見 Douglas

又再如「人文主義」一條，《新文化辭書》中的全文如下：

> Humanism（英）〔人文主義〕
>
> 人文主義，在消極方面是反抗教權萬能主義，在積極方面是唱道人性和世俗的生活之價值的一種主義。就是，稱那在文藝復興期（Renaissance）排斥中世紀以宗教爲中心的學風，專研究希臘，羅馬之古典的人文底人文派或人文學者的精神。元來，希臘人愛自然，樂人世，以在現世實現幸福的生活爲理想。所以，對於中世紀宗教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思想不滿意的中世紀之有識者，其趨向古文藝，是自然的趨勢。到了以希臘，羅馬底文物和文化——就是以那時代的文學，美術——爲人文底精華，以古典爲有最可貴的價值，而欲把他通通地復興起來的時候，所謂人文主義，已經流行了。在這樣地興起的古文學中，主要的是柏拉圖（Plato=Platon）學派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Aristoteles）學派。最先發生人文主義的，是意大利。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精神，由滕推（Dante），潘脫拉嘉（Petrarca），布嘉肖（Boccaccio），雷渥那德（Leonardo da Vinci）等所鼓吹，而尤爲潘脫拉嘉所提倡；一方面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陷落後，東方學者來到意大利的也不少，對於滕推等文藝復興底勢力越發是推波助瀾；於是意大利底人心，一般對於古代文藝惹起了感興來，而人文主義就是這樣發生起來了。這運動不只限於意大利一國，更由德意志，法蘭西而荷蘭，西班牙，英吉利，以次傳播於各國。在教育上，人文主義是用爲古典主義的意義，和現實主義相對待的。現實主義是以實物爲主，重經驗，貴實利；反之，人文主義是以言語爲主，重理想，貴美的陶冶；併且看重個人性，努力於個人底滿足和個性底發揚。總之，人文主義底教育，與其說是主張給與多數實質的知識，寧可說是

R. Reynolds, “Japanese Encyclopaedias: A Hidden Impact on Late Qing Chinese Encyclopaedias?,” in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pp. 163-164.

> 主張以教育爲完成人道的方法，由古語底學習以磨鍊精神。但是其弊端，使學者雖得爲典雅的古代人，而不得爲足以馳驅奔競於優勝劣敗之競爭場裏的近代人。這意大利的人文主義傳播於西歐各國，凡是近代的教育思想家，不受他的影響的，除了培根（Bacon）一派現實主義者以外，差不多沒有看見。特在教育上有名的，是德國的愛拉士墨斯（Desiderius Erasmus）和西班牙的衛和（Jean Luis Vives）。又這主義也影響到宗教和政治上去，那英國多馬斯莫亞（Thomas Moore）底《烏托邦》（Utopia），或意大利馬噶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專制國家底理想》，或德意志的亞爾壽脩斯（Johannes Althusius）的《民族意志至上說》，雖然貌看似乎和這主義沒有關係，其實是從同一精神發生的（參看「新人文主義」）。[108]

筆者對照《日本百科大辭典》關於「人文主義」一條的內容，與《新文化辭書》所述不同。不過，《新文化辭書》中關於「人文主義」的描述，亦是出自日本編纂的大型百科辭書。1901 年，同文館以「大日本百科辭書」爲名，計畫出版一套以德國模式爲主軸的百科全書，其深度和廣度則要超越明治日本翻譯的第一部百科全書 *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同文館以八大主題：商業、醫學、教育、法律、工業、經濟、農業和哲學爲出版方向，其中預計出版商業大辭書 2 冊（1906-1908）、醫學大辭書 3 冊（1906-1908）、教育大辭書 3 冊（1907-1908）、法律大辭書 6 冊（1909-1911）、工業大辭書 5 冊（1909-1913）、經濟大辭書 9 冊（1910-1916）、農業大辭書 2 冊（1911）和哲學大辭書 5 冊（1912、1913-1926）。

1911 年，同文館因爲經濟問題倒閉，接手的博報堂續以同文館爲名，組織編輯委員會，接手出版事宜。不過，有許多規劃的系列並未如期按照既定冊數出版。[109]筆者透過檢視其中的《哲學大辭書》發現，「人文主義」一條，是

108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433-435。

109 Douglas R. Reynolds, "Japanese Encyclopaedias: A Hidden Impact on Late Qing Chinese Encyclopaedias?," in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沿襲自第 4 冊的內容，該詞條爲吉田熊次（1874-1964）所撰寫。在內容構成上，《新文化辭書》選擇先翻譯《哲學大辭書》「人文主義」第三節的「特性」，接續關於「沿革」的部分，最後則摘錄人文主義教育學者的部分，兩項文本的比對，請見附錄 1。[110]留學日本的范壽康與這項詞條的主筆者吉田熊次 1913-1919 年間都在東京大學文學部念書和教書。吉田熊次當時是助教授，兩人研究的課題都屬教育哲學。筆者推測范壽康上過吉田熊次的課程。這項詞條也可能是范壽康經手修訂，甚至是出於范壽康之建議。

至於「社會主義」一詞則是介紹三種廣狹義的社會主義流派，繼而說明社會主義之名稱是來自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最後則以介紹各派的代表人物作結。[111]這部分的內容則是引自第 3 冊樋口秀雄（1875-1929）所撰寫的詞條，只是是以摘錄的方式行文，並且省略了《哲學大辭書》中共產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批評，以及由藤井健治郎（1872-1931）撰寫的倫理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一節。[112]兩份文本的比對，請見附錄 2。對於唐敬杲來說，對樋口秀雄這位作者並不陌生。商務印書館在 1921 年就曾出版《近代思想解剖》一書，[113]爾後這本書還被誤植爲唐敬杲本人的著作。[114]因此，另外一條同樣是由樋口秀雄寫就的詞條「虛無主義」，[115]《新文化辭書》幾乎是原封不動地全文照搬，[116]可見附錄 3 的對照。

透過這四項詞條「啓蒙哲學」、「人文主義」、「社會主義」和「虛無主義」，我們可以得知在內容的編寫上，《新文化辭書》是沿襲 1910 年代日本

Ways of Thought, p. 164. 以《哲學大辭書》爲例，辭書的本體有 6 冊，加上總目錄、索引和追加的詞條 3 冊，共計 9 冊。

110 吉田熊次，〈人文主義〉，收入大日本百科辭書編輯部編纂，《哲學大辭書》（東京：同文館，1911），冊 4，頁 1615-1617。

111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927-933。

112 樋口秀雄、藤井健治郎，〈社會主義〉，收入大日本百科辭書編輯部編纂，《哲學大辭書》（東京：同文館，1910），冊 3，頁 1278-1286。

113 譯者列名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114 唐敬杲，《近代思想解剖》（臺北：廬山出版社，1974）。

115 樋口秀雄，〈虛無主義〉，收入大日本百科辭書編輯部編纂，《哲學大辭書》（東京：同文館，1909），冊 1，頁 516-517。

116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696-697。

出版的《日本百科大辭典》和《哲學大辭書》。筆者將《新文化辭書》和《哲學大辭書》的條目一一進行比對，在專有名詞部分，有 177 項詞條與《哲學大辭書》重複；在人名部分，有 152 項詞條與《哲學大辭書》重複。以《新文化辭書》全書 759 項詞條計算，有接近一半的詞條可在《哲學大辭書》中覓得蹤跡。就筆者的觀察而論，《新文化辭書》在詞條的採擇上應是從《日本百科大辭典》和《哲學大辭書》尋求靈感，惟在詞條的內容上則大多選取《哲學大辭書》的內容。這是因爲《日本百科大辭典》蒐羅的詞條仍是以廣泛的性質爲主，每項詞條對應的內容較短；《哲學大辭書》收錄的是專門的詞條，每項詞條對應的內容較爲詳盡，這在性質上剛好符合《新文化辭書》的取向。

有論者提及晚清的百科全書有直接翻譯自西文或日文者，[117]有連編帶譯者，也有只進行剪刀糨糊工作的「拿來主義」者，內涵知識尚未經過消化選取，便加以拼湊。眞正用心搭建論述框架的百科全書，爲數不多。[118]「拿來主義」的論斷，大大簡化了《新文化辭書》背後複雜的思想工程以及編輯群的多重考量。以唐敬杲爲首的商務印書館的知識人，仍要透過選取詞條、閱讀日本的百科全書並且進行翻譯，很難斷定這樣的工作不具任何知識上的意義。[119]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新文化辭書》的編輯團隊傳遞了他們所認爲代表「新文化」的各色詞條。對筆者而言，透過比對詞條內容的意義在於檢視哪些內容被翻譯出來，正是檢視唐敬杲及其同人編纂《新文化辭書》心智勞動（intellectual labor）

117 譬如 1903 年，由留日學生范迪吉主持編譯的《普通百科全書》出版，這是晚清中國最早被冠以「百科全書」之名出版的套書。根據石川禎浩的研究，《普通百科全書》是范迪吉從日文工具書中摘編而成的漢文譯本。石川禎浩提出《普通百科全書》共計 100 卷，根據難易度分爲三級（初級學類 17 卷、普通學類 21 卷、專門學類 62 卷），與其對應的日文版原著中，初級學類是翻譯自富山房刊行的《普通學問答全書》，普通學類大部分翻譯自富山房的《普通學全書》系列和文部省出版的《百科全書》，專門學類則翻譯自博文館的《帝國百科全書》系列。見石川禎浩，〈近代日中の翻訳百科事典について〉，收入石川禎浩、狹間直樹編，《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訳概念の展開》，頁 287-288。

118 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研究》，頁 76-85；陳平原，〈作爲「文化工程」與「啓蒙生意」的百科全書〉，收入《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 7。

119 黃興濤也有相似的論斷，見黃興濤，〈「新文化」的出版姿態、知識構建與社會傳播——1923 年商務版《新文化辭書》的歷史透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 年第 6 期，頁 162。

的證據，[120]也是商務印書館同人集體「智識實踐」（intellectual practices）[121]下的成果。

六、編輯作為創造性的心智勞動

在《新文化辭書》所收錄的 759 個詞條中，有一群以「主義」或“ism”後綴的詞組，這類型的詞條共有 205 個，幾乎佔據《新文化辭書》三成的篇幅。如同洛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所云，以“ism”後綴的詞彙代表的是一項律則而非單一的學說教條，以“ism”後綴的詞彙蘊含的是不同的個人與群體，如何透過“ism”的名稱思索詞彙中各種截然不同甚至是衝突的學說。因此，以“ism”後綴的詞彙代表的是結合各種潮流、學說和運動（movement）的複合名稱（names of complexes）。[122]又如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言，以“ism”後綴的詞彙是承載現代性的關鍵概念，這類型的詞彙與“is(z)ation”後綴的詞彙一樣，都具有向未來發展的特質和具備「運動」的性質。[123]在這一節中，本文將用《新文化辭書》中以「主義」或“ism”後綴的詞彙作爲討論之資，分析《新文化辭書》的編輯意圖。

120 這是借用高哲一研究《辭源》的術語，見 Robert Culp 著，陳建守譯，〈定義現代性：《辭源》與現代中國詞彙的創制〉，收入沙培德、張哲嘉主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295-322。

121 「智識實踐」一詞權借英國史家柏克（Peter Burke）之語。柏克認爲受到文化轉向的思想史研究，開始措意「智識實踐的文化史」（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作爲文化實踐的「知識」和「資訊」成爲思想史或文化史的新發展，有助於理解「知識」在不同時空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置放的位置，以及知識如何生產、傳播和被接受的過程。見 Peter Burke, “Cultural History and Its Neighbours,” *Culture & History Digital Journal*, 1:1 (May 2012), http://dx.doi.org/10.3989/chdj.2012.006 (accessed March 10, 2020); Peter Burke,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An Overview,”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pp. 103-128.

122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0), pp. 4-6.

123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0; Jussi Kurunmäki and Jani Marjanen, “A Rhetorical View of Ism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3:3 (September 2018), p. 246.

首先，相較於西方世界“-ism”詞彙的發展，近代中國的「主義」首先遭遇的是翻譯的問題。根據陳力衛的研究，「主義」一詞在日本出現之初是用來對譯“principle”，意指原理、原則，這是從傳統漢語中借來的用法。相較於此，近代中國早期的翻譯則是以「理」和「道」來進行對譯，此一譯法被日本繼承，日語先後出現「～論」、「～教」、「～學」和「～說」的譯法，[124]一直到井上哲次郎的《哲學字匯》出版後，「主義」才做為“-ism”詞綴的對譯，開啓了往後「主義」譯法流行的端緒。[125]在《新文化辭書》中，可以大致看出以「論」和「主義」對譯“ism”的譯法，兩者的差別在於以「論」翻譯的詞條，通常是指某種理論或是某位學者的學理見解，如“Darwinism”翻譯爲「達爾文底進化論」、“Evolutionism”翻譯成「進化論」和“Lamarckism”翻譯爲「拉馬克的進化論」。[126]利用「主義」來翻譯“ism”的詞條爲數較多，則多涉及政治意識形態的討論、或者是學說式的思考和行爲，[127]如「布爾札維主義」（Bolshevism）、「資本主義」和「世界主義」等。[128]

其次，以「主義」做爲後綴的詞條實則對某項概念增添了獨佔的宣稱。舉例來說，自由主義因其「主義」的後綴語，一方面是將語義限制在「自由」這個概念上，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主義」之故，這項詞條便成爲一種範疇化和普遍化的概念。[129]然而，在《新文化辭書》中，尙有強調特殊應用的修辭形式，亦即在某項普遍化的「主義」宣稱之前，冠上新的接首語，強調其特殊用法。舉例來說，在《新文化辭書》中有「社會主義」一條，同時也有「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合理的」社會主義、「修正派」社會主義、

124 “Buddhism”翻譯爲「佛教」應是由此而來。

125 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 338。

126 這些詞條分別參見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228-232、307-308、544-546。

127 Michael Freeden, *Ide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128 這些詞條分別參見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65-74、155-156、207-208。

129 Jussi Kurunmäki and Jani Marjanen, “A Rhetorical View of Ism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3:3, p. 243.

「科學的」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等。[130]這些內容原先應當都收在「社會主義」詞條項下，《新文化辭書》的編輯團隊特別提萃成獨立的條目，應當是考慮到概念傳播的便利性，讓當時的讀者更容易理解「社會主義」的內涵。這些相互交會的詞條，就如同概念的叢集，彼此相映，每項詞條不單只是該詞條的定義和解釋，而是幾種相關的概念被匯聚至某項主義的詞條底下。進一步來看，在編輯意圖上，《新文化辭書》的編輯團隊以這樣的修辭形式來表述「社會主義」，是意欲將社會主義這項普遍化的理則，增添特殊的思想、政治和社會的情境。這樣的作法有助於讀者在閱讀《新文化辭書》後，對於自身的政治和社會狀況進行聯想，甚至在下筆爲文時，可以藉由詞條的對照反身思索。我們可以想像一位支持以國家力量漸進改革社會的讀者，勢必會在「國家社會主義」的詞條中尋覓到爲什麼他會支持的靈感。閱讀完「國家社會主義」後，這位讀者會知道其立場與「基爾特社會主義」有異，而趨近於「講壇社會主義」的保守立場。[131]

第三，《新文化辭書》出版前夕，中國思想界歷經兩大論戰：1919 年的「問題與主義」和 1923 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新文化辭書》所收錄的詞條正反應這兩波辯論的成果。肇端於 1919 年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導火線是李大釗（1889-1927）在俄國大革命後，發表了一系列談論「主義」的文章，引起了胡適的注意。持論有別的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否有一種籠罩一切的「主義」，可以全盤地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李大釗認爲存在可以根本解決問題的單一「主義」，信奉杜威實驗主義的胡適則認爲問題是要一個一個解決，「主義」只是解決問題的一種「參考材料」，而非一種「天經地義的信

130 這些詞條分別參見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188-189、371-376、792-795、811-815、903、934-935、969-971。「社會主義」並非孤例，《新文化辭書》中尚有以「倫理的快樂說」、「進化論的快樂說」、「個人的快樂說」和「公眾的快樂說」來解釋 “Hedonism”。

131 這並非筆者的臆測，一位名叫藍孕歐的作者在《時事新報》上爲文闡發「進化」一詞時，就提及是參考了《新文化辭書》和《大英百科全書》的內容。見藍孕歐，〈進化的意義——解釋和評論〉，《時事新報．學燈》，1924 年 4 月 16 號，第 1 版。

條」。[132]「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焦點在於「主義」是否能解決「問題」，1923 年興起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基本理路則是：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的問題。這場論戰起源於張君勱（1887-1969）在 1923 年 2 月 14 日於北大一場名爲「人生觀」的演講，張君勱提出科學與物質文明在歐洲已經爲大家所質疑甚至厭惡，青年人應該回歸「精神文明」的理學傳統。丁文江（1887-1936）聞後怒不可遏，視張君勱之論是與科學爲敵，隨即撰〈科學與玄學〉回擊，提出人生觀是受科學方法所制約的。雙方陣營你來我往，張君勱得到張東蓀（1886-1973）、林宰平（1879-1960）、范壽康、瞿菊農（1901-1976）和梁啓超（1873-1929）等人的支持，丁文江則得到胡適、王星拱（1887-1949）、任鴻雋（1886-1961）、朱經農（1887-1951）、唐鉞（1891-1987）、陸志韋（1894-1970）和吳稚暉（1865-1953）等人的助拳。[133]

這兩大論爭所涉及到的「主義」都可以在《新文化辭書》找到相應的詞條。在「問題與主義」的論爭中，無論是李大釗所提及的“Bolshevism”，抑或是胡適信仰的「反主義的主義」：實驗主義，以迄胡適劍指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或「基爾特社會主義」，[134]都曾出現在《新文化辭書》中。至於「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被雙方提及的「進化論」、「唯心論」、「唯物主義」、「自然主義」、「經驗主義」和「新康德主義」等，也都位列《新文化辭書》之上。[135]更因爲范壽康之故，[136]對於偏向「人生觀」陣營的詞條多所選列，如「主情說」、「快感說」和「直覺主義」等詞。[137]

---

132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4（2013 年 6 月），頁 27-32。

133 羅志田，〈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後「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245；沈展雲編，《五四思想論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頁 xix-xx。

134 李林，〈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本來面目〉，《二十一世紀》，總期 8（1991 年 12 月），頁 21-24。

135 羅志田，〈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後「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頁 257-258。

136 范壽康東渡日本先以教育學爲主修，爾後改習哲學，受德國新康德派的先驗哲學影響很深。見氏著，〈教育哲學大綱〉，收入宋恩榮編，《范壽康教育文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頁 1-3。

137 彭小妍從五四代表理性啓蒙的反面入手，探究「人生觀」一派的唯情論述，如何同時存在於五四論述的脈絡。見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啓蒙》（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最後，有論者指出《新文化辭書》中收錄了不少「左傾」的詞條，對於馬克思主義抱持寬容甚至是引介的立場，替五四後思想文化界傳播馬克思主義奠下基礎。[138]本文認爲這樣的說法不免有過於後設之嫌。《新文化辭書》出版之際，中國共產黨甫成立兩年，尚是往後國民黨尋求合作的對象。俄國所吹來的十月的風，還盤旋在中國的天際，「以俄爲師」方才是時興的理念。人們對於西方的思想如飢似渴，這些看不到的思想，就猶如吹動樹葉的風。這些被風吹動的樹葉，搖晃最劇烈的就是關於「主義」的詞條。我們雖然無法目視到思想，但從這些形形色色「主義」的翻譯詞條中，卻可以想見人們對於思想的反應，各種迎拒、期待，乃至於翻譯內容的挑選、縮減，看到一群嚮往以「主義」尋求解決之「道」的人們。[139]本文認爲，這才是《新文化辭書》編輯團隊焚膏繼晷、勉力以赴的初衷。況且，進一步從內容進行檢視，《新文化辭書》中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乃是持平的學術立場，並無特意的宣傳。[140]在「修正派社會主義」條目就指出：「修正派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改革，乃關於馬克斯主義的基礎，是要從社會主義的立腳點，將馬克斯主義推翻的。」[141]爾後更進一步指出修正派社會主義的領頭人物對於《唯物史觀》的批判，認爲馬克思太過將人類的意識和社會的存在對立，令人頓生人類不過是「爲歷史的力所左右的」，並且反對唯物主義的歷史解釋，藉以攻擊馬克思的歷史觀。[142]引用這項詞條並不是要說明《新文化辭書》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而是要說明《新文化辭書》並未特意地宣傳或批判某項主義。

從《新文化辭書》對於「主義」詞條的蒐羅之廣以及編輯團隊對於詞條譯名的著墨，可以讓我們看見編輯群對於詞條選譯之主動性。《新文化辭書》並

138 黃興濤，〈「新文化」的出版姿態、知識構建與社會傳播——1923 年商務版《新文化辭書》的歷史透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 年第 6 期，頁 167-168。

139 用王汎森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從「主義」到「新主義」的思想轉變過程，見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4，頁 35、41。

140 李歐梵也有同樣的看法，見李歐梵著，楊明晨譯，〈《新文化辭書》試釋〉，《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總期 1，頁 184。

141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811。

142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812。

非皆以「主義」翻譯以“ism”爲後綴的詞彙；以「主義」翻譯的詞條，同樣不全然對譯“-ism”。這一方面涉及「主義」的修辭形式，另一方面則可見證當時「主義」流行的風潮。就實際內容翻譯而言，《新文化辭書》也並非照搬日文辭書的說法，而是有其自我理解的脈絡存在。僅以上文討論的「社會主義」爲例，在「社會主義」的日文詞條中說馬克思絕非想攻擊資本家，《新文化辭書》詞條中卻說：「現時的社會狀態，正是勞動者當奮起而一變其形勢的時期。」[143]兩項詞條的主詞完全錯位，顯見商務編輯群有其自身考量，如何符應在地的情勢才是首選。

此外，透過《新文化辭書》之例，我們可以趁機反思詞典和百科全書研究的可能性。過去我們對於詞典和百科全書這類工具書性質的書籍，都認爲是賦予新詞彙／概念的權威性和穩定性，亦即加以「界說」和「辨正」的工具。字典就如同上天傳遞給人類的工具，裡頭充滿眞理和智慧，猶如上帝一般，絕無謬誤。[144]前文論及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因其內容的精簡，勉強可說是對於詞彙進行「界說」和「辨正」，透過黃人之手逐條設定的學科性質，亦可獲窺時人對於學科對應概念的「邊界」，如何漸次明朗。但《新文化辭書》的詞條內容詳盡，要說是加以「界說」或「辨正」，似乎太過冗長。《新文化辭書》的性質比較像是當時中國「加入世界」的宣示，是一種亟欲加入世界的實驗。[145]與其說唐敬杲及其同人要劃定詞彙或概念的知識邊界，倒不如說是要擴大詞彙或概念的知識邊界。唐敬杲和其同人所思所爲是要如何提供「最多最廣」的需求來打造《新文化辭書》，而非思考如何劃定與釐清知識邊界。

143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頁 932。
144 柯芮．斯塔柏（Kory Stamper）著，吳煒聲譯，《爲單字安排座位的人：美國最暢銷字典的幕後，爲世界寫下定義的編輯人生》（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20），頁 29-30。
145 羅志田，〈理想與現實——清季民初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互動〉，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 296-303。

七、結　語

五四運動發生後，章錫琛（1889-1969）有過這樣的觀察：「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詞，頗流行於吾國之一般社會，以其意義之廣漠，內容之不易確定，頗惹起各方之疑惑辯難。迄於最近，則新思想三字，已鮮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語，乃代之而興。」[146]章錫琛的觀察，明確指出「新文化」一詞是五四之後的社會流行詞彙。鄭振鐸（1898-1958）在五四之後觀察當時的出版界，認爲樂觀之處在於定期出版物的發達，悲觀之處在於大多數的知識人還是沒有長進的覺悟心。鄭振鐸認爲，1919 年的中國出版界雖然生機蓬勃但卻淺薄，在出版品中，最爲缺少的是哲學和科學這兩類書籍。因此，鄭振鐸期許：「以後思想界要改變態度，下實在的研究的工夫纔好。」與 1919 年的出版界相較，鄭振鐸希望 1920 年的出版界能夠免除 1919 年的弊病，繼續保持出版的盛況，「更加一些切實的研究」。[147]鄭振鐸的這項期許在其以記者身分爲《新文化辭書》所寫的介紹文中表露無遺：

> 我們國裏這幾年來的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功績，就是把我國人在文化上拘墟自大的態度破除了；從此，人人都切實地有採求真知底必要。出版界順應這種要求的新出版物，雖然陸續出的不少；但是包羅各方面的知識，為系統的敘述的書籍，究竟還不曾有。知識饑荒一句標語，在國裏面，還是十分狂熱地叫着，但是現在呢，滿載着精神上糧食的救濟船──《新文化辭書》──出現了，我們至少可以得些較美的食糧了。[148]

146 「署名」君實，〈新文化之內容〉，《東方雜誌》，卷 17 號 19（1920 年 10 月），頁 1。

147 鄭振鐸，〈1919 年的中國出版界〉，收入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份》（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卷 1，頁 382-384。本文原載《新社會》，號 7（1920 年 1 月），頁 10。

148 〈介紹新文化辭書〉，《小說月報》，卷 14 號 12，頁 2。

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鄭振鐸對於《新文化辭書》的高度評價，認爲它不僅是回應新文化運動的切實研究，更是第一本蒐羅各方面知識且系統陳述的書籍。1925 年 9 月，商務印書館將旗下所有的出版品整理成《新文化書目》一書供讀者索取。在一份當時的報紙廣告中，將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品宣傳爲「新人物必讀新文化書」。[149]在這份書目中，《新文化辭書》被列爲「雜著」一項。[150]《新文化辭書》代表的是「需將全世界學說無限制的盡量輸入」之一例，[151]是一本「對於歐化爲整部之輸入」的辭書。[152]

透過本文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這《新文化辭書》是商務印書館爲求經營生財之道，進行轉型下應運而生的產物。這本辭書的大部分編纂者都具有留學日本的經驗，從筆者所比對的詞條來看，內容上吸納了日本百科辭書的成果，見證了日本百科辭書的影響力。同時，《新文化辭書》又是一部因緣際會的產物，它固然如其宣稱具有新文化運動的時代烙印，但編輯群的學思背景已經屬於前一波新潮。所以作爲新思潮的競逐者，與一般所注意的引領風氣之先的開創者，雖然在大方向上類似，卻又微妙地不同調。更重要的是，競逐新文化本身是具一定創造性的文化工程，在心智勞動的過程中有各方面具體的考量，若是以「拿來主義」一筆抹煞的話，無助於我們理解知識生產中的各個層面。

佔據《新文化辭書》三成篇幅的「主義」類詞條，可以證明當時中國思想界充斥著各色「主義」，爲後五四時期的主義時代揭開序幕。[153]過去對於「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傾向認爲持論有別的雙方，最後以各說各話的僵持立場告終。若從《新文化辭書》的內容切入，則可看出「主義」的大行其道，「主義」就如同一種便捷的法門，透過「主義」可以快速索隱到某種知識、學說甚至信仰。《新文化辭書》可謂是對「問題與主義」論戰的表態，「主義」的力量於

149 〈新人物必讀新文化書〉，《農商公報》，卷 9 冊 11（1923 年 6 月），無頁碼。
150 商務印書館編，《新文化書目》，頁 33。
151 這是梁啓超對於譯介西方學說的態度之闡述。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專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冊 6，頁 65。《清代學術概論》出版於 1921 年。
152 商務印書館編，《新文化書目》，頁 18。
153 王汎森對此有精闢的研究，見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 ——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4，頁 3-88。

此一覽無遺。因為編輯成員之故，《新文化辭書》對於「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的兩派說法皆有所蒐羅，兩不偏廢。從《新文化辭書》中所折射出的「新文化」，正可以讓我們得知商務印書館肆應的「新文化」，因為出版牟利的商業考量，是從寬廣的立場入手，盡可能地蒐羅市面上流動的思潮。唯有如此，編輯這類型的辭書，才可能僅「一更裘葛」，[154]便在最短的時間內，編輯出一冊無所不包的辭書。

[154] 研究字典的學者告訴我們，決定收錄哪些詞彙是編纂字典最耗時的第一步。見柯芮·斯塔柏（Kory Stamper）著，吳煒聲譯，《為單字安排座位的人：美國最暢銷字典的幕後，為世界寫下定義的編輯人生》，頁 117-132。

附錄 1

《新文化辭書》	《哲學大辭書》
Humanism（英）[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在消極方面是反抗教權萬能主義，在積極方面是唱道人性和世俗的生活之價值的一種主義。就是，稱那*在文藝復興期（Renaissance）*排斥中世紀以宗教爲中心的學風，*專研究希臘，羅馬之古典的人文底人文派或人文學者的精神。*元來，希臘人愛自然，樂人世，以在現世實現幸福的生活爲理想。所以，對於中世紀宗教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思想不滿意的中世紀之有識者，其趨向古文藝，是自然的趨勢。到了以希臘，羅馬底文物和文化———就是以那時代的文學，美術———爲人文底精華，以古典爲有最可貴的價值，而欲把他通通地復興起來的時候，所謂人文主義，已經流行了。在這樣地興起的古文學中，主要的是柏拉圖（Plato=Platon）學派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Aristoteles）學派。 最先發生人文主義的，是意大利。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精神，由滕推（Dante），潘脫拉嘉（Petrarca），布嘉肖（Boccaccio），雷渥那德（Leonardo da Vinci）等所鼓吹，而尤爲潘脫拉嘉所提倡；一方面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陷落後，東方學者來到意大利的也不少，對於滕推等文藝復興底勢力越發是推波助瀾；於是意大利底人心，一般對於古代文藝惹起了感興來，而人文主義就是這樣發生起來了。這運動不只限於意大利一國，更由德意志，法蘭西而荷蘭，西班牙，英吉利，以次傳播於各國。 在教育上，人文主義是用爲古典主義的意義，和現實主義相對待的。現實主義是以實物爲主，重經驗，貴實利；反之，人文主義是以言語爲主，重理想，貴美的陶冶；併且看重個人性，努力於個人底滿足和個性底發揚。總之，人文主義底教育，與其說是主張給與多數實質的知識，寧可說是主張以教育爲完成人道的方法由古語底學習以磨鍊精神。但是其弊端，使學者雖得爲典雅的古代人，而不得爲足以馳驅奔競於優勝劣敗之競	人文主義（ジンブンシュギ） **英 Humanism. 獨　略　佛　略** **一　意義** 一　すべて出世間的・宗教的なる事を排して世間的・人間的なる事を中心とする思想・信念若くは行為をいふ。 二　*文藝復興時期に於て専ら希臘・羅馬の古典的人文を研究せる所謂人文學者の主義・精神・理想を特に人文主義といふ。*また此を原音のままヒュマニズムといふ學者も少なからず。 **二　沿革**　人文主義初期の舞臺は伊太利なりき。これ第一伊太利は他の西歐諸國に比して古典と密接なる歴史的關係を有したると第二所謂闇黒時期の間に他の諸國に在りては古代の文學藝術は殆ど煙滅したるも伊太利にありては古代殊に羅馬の人文が主として僧侶の手によりて保管せられらたると、第三伊太利に於ては既に早くダンテ（一二六五—一三二一）・パトラルカ（一三○四—一三七四）・ボッカチオ（一三一三—一三七五）によりて稱へられたる文藝復興の精神が一四五三年コンスタンチノーブルの陷落により東方の學者の多く伊太利に逃げ來りたる事によりて更にその勢力を高めたる事等に依るなり。（中略）かくて先づ伊太利に於て開始せられたる人文主義の運動は獨逸を初めとして遂に和蘭・西班牙・英吉利の諸國に傳播せらるゝに至れり。 **三　特性**　人文主義の顯著なる特性は、その消極的方面に於ては宗教を中心とする中世の教權万能主義の思想及び文化に反抗せる事にしてその積極的方面に於ては人性と世間的生活との價値と旨趣とを尊重せるにあり。由來希臘人は自然を愛し世間を樂み現世に於て幸福なる生活を營まむ事を以て理想としたれば中世の宗教的・出世間的・超自然的の思想に倦みた

爭場裏的近代人。這意大利的人文主義傳播於西歐各國，凡是近代的教育思想家，不受他的影響的，除了培根（Bacon）一派現實主義者以外，差不多沒有看見。特在教育上有名的，是德國的愛拉士墨斯（Desiderius Erasmus）和西班牙的衛和（Jean Luis Vives）。又這主義也影響到宗教和政治上去，那英國多馬斯莫亞（Thomas Moore）底《烏托邦》（Utopia），或意大利馬噶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專制國家底理想》，或德意志的亞爾壽脩斯（Johannes Althusius）的《民族意志至上說》，雖然貌看似乎和這主義沒有關係，其實是從同一精神發生的（參看「新人文主義」）。	る中世期末葉の一派の學者が眼を轉じて先づ古代希臘羅馬の人文の復興を計り之に依りて人の人たるべき性能を養はんとせるはまた自然の歸趣といはざるべからず。（後略） **四　教育上の人文主義**　教育上に於ける人文主義なる語は、現實主義（realism）に對する古典主義てふ章義にしようせらるるを常とす。現實主義にありて實物を主とし、經驗を重んじ、實利實用を貴ふに反し、人文主義にありては言語を主とし、理想を重んじ、美的陶冶を貴ふの傾向を有す。而して何故に漸る教育主義を稱して人文主義と呼ぶかは歷史的事情に基くものとす。（後略） **五　人文主義教育の發達**　（前略）文藝復興時代の人文主義の教育は先づ伊太利に起りしこと此の如し然るに其主義は次第に西歐羅巴諸國に傳播せり。 **六　人文主義教育の特質　略** （吉田 熊次）

附錄 2

《新文化辭書》	《哲學大辭書》
Socialism（英）[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底意義有種種解釋，決不是一樣的。就是關於救濟社會缺陷的方針，有主張從根本上救濟人心，使其靈性奮發的；有主張須憑藉國家之力的；有主張一切社會財產共有的；也有主張公平分配的；也有罵倒這般社會，痛論破壞現存社會國家之必要的；又有欲依着宗教道德之力，或由政權之獲得以遂行其目的的。這都由於唱說者底性行，境遇的差異，和其所處社會國家的狀態之不同；其他對於社會問題的政策，或間接上學術的進步等，也都是他的重要原因。 社會主義底意義，固然有廣狹的種種解釋，但大體上可分爲三種。（一）最廣義的解釋，是稱那欲使個人的意志和活動，全依着社會公共	**社會主義（シャカイシュギ）** **英 Socialism.** **獨　略** **佛　略** **一　意義**　社會主義の語は廣狹種々の意義に於て用ひらると雖、その大體に就て之を彙類すれば、少くとも之を三類に分つを得べし。第一の用例に於ては、個人的活動をして、社會公共の目的に從位たらしめんとする一切の傾向を言ふ。此意義よりすれば、狹義の社會主義は固より、教育上に於ける社會的教育、倫理上に於ける社會的倫理學、經濟上に於ける社會的經濟學、國家社會主義および社會改良の事業の如き皆此中に入る。アドルフ、ヘルド（Aodlf Held）が、個人の意志をして社會の夫に從屬せしめん

目的的一切傾向；那狹義的社會主義固不待言，就是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講壇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Chair）和社會改良主義（Social Reform）也都包含在內。（二）是稱那主張於一般社會上採平等主義，於産業上生産機關概爲社會共有，平等分配的傾向。在這意義上以狹義的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爲始，包含無政府主義（Anachism），虛無主義（Nihilism）。（三）專指狹義的社會主義———就是關於工業制度（特別是勞動問題），要求生産機關（土地和資本）底公有；關於分配問題，要求以比例的報酬歸於勞動者之一種社會改革底主張。如那所謂近世社會主義———尤是馬克斯（Karl Marx）派———的社會主義，在事實上欲和政治運動結合，以實行社會改革底主義。 「社會主義」這個名稱，是在一八三五年英國勞勃德歐文（Robert Owen）底社會運動以後使用的。這狹義的社會主義雖是很近的事；但社會主義的精神，差不多自有史以來就有的。在古代希臘如柏拉圖（Plato=Platon）底《理想國》，在英國如多馬斯莫亞（Thomas Moore）底《烏托邦》（Utopia）那一種空想的共産主義思想，漸漸地變爲現實的思想，而十九世紀所特有的社會事情，尤使此思想採一種形體而變爲近代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以下略述狹義的社會主義———就是近代社會主義———底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之一斑：	とする一切の傾向は皆社會主義的なりと解し、ロッシェル（Roscher）が、人性を主とせんよりは共通の目的を重んぜんことを要求する諸傾向なりと釋せるが如きは、此意義に於て通ず。これ社會主義の語の最廣義の用例なり。此の意義に於ては吾人は通例の慣用より來る誤解を避け、及びその本義を一層明白に表示し得る點に於て、社會本位説の譯語を附するを以て更に適切なりと信ず。第二の用例に於ては、一般社會上に平等主義を取り、産業上にては生産の機關を社會の共有とし、分配を平等ならしめんとする諸傾向を總稱す。此意義に於ては、共產主義并に狹義の社會主義を始とし、無政府主義及び虛無主義等をも此中に包含せしむる者多し。これ社會主義の語の廣義の解釋を取るものたり。ミル（J. S Mill）が、社會主義の特質は生産の機關及手段を社會の各成員の 爭共同所有に歸せしむるにありと爲し、又たシェフレ（Schäeffle）が社會主義の第一步は資本の私有及び競爭を廢して、代ふるに共同の集合資産を以てするにあり、と説きたるは此の類なり。第三の用例にては、産業制度に勞働問題に關して、生産機關（土地及資本）の公有及分配の上に於ては勞働に對する比例的報酬の要求を中心とする社會改革の主張を云ふ。謂ゆる近世社會主義之に屬す。就中マルクス派の社會主義その中堅たり。ジャネー（Janet）が、國家が社會の富の不正均を匡正し、法によりて餘れるに奪ひ、乏しきに與へ、以て平均を得しむべき權能を有せりとする諸傾向は即ち社會主義なりと説けるは、此の種の見解に近し。狹義の社會主義特にマルクス派の社會主義は、事實上に於て政治的運動と結合し、政治上に於て民主々義を取り、普通選擧によりて下級人民の意志を國家の統治上に實現せしめんと期するが爲めに、社會主義の本領は政治上の民主々義と、必然的に伴へりと爲すものあり。然れどもこれ事實上の運動と社會主義の本領とを混同せる誤解にして、獨り獨逸の社會民主黨の主張に對してのみ適用し得べき偏狹なる解釋に過ぎず。社會主義の語は英國に於いて近世社會主義の始祖と稱

	せらるゝロバート、オーエンが、その社會主義的運動を始めたる以後に於て作られたたる用語にして、その嚆矢は一八三五年前後にありと稱せらる。……
	三　學說
歐文（一七七一———一八五八）他是稱爲近世社會主義之始祖的人。他不是理想者而是實行者。他常以勞動者底品格向上和生活改善爲己任，因爲這個緣故，蕩盡了巨萬的家私；他特別注意於下等社會的兒童教育，爲英國貧兒學校底創立者。一八一三年，和他的同志組織一種團體，實行博愛事業。一八一七年，爲救貧上立一種社會主義的共產組織底計畫，努力於工場法之制定等。	一　オーエン(Robert Owen, 1771-1858)オーエンは近世社會主義の始祖と稱せらるゝと雖も、彼はむしろ實行の人にして理論の人に非ず。其志しし所は労働者の品位の改善向上にありて、爲にその富膽なる資本を盪盡して惜まざりき。彼れ年少にして大工場の支配人となり、多數の職工を使用せしが、その多くが竊盜・姦淫・飲酒などの罪惡を事とし、その結果狀況を極むるを見て、之を救濟するを以て己れが任と爲し、特に意を幼年者の教育に用ひ、爲に英國に於ける兒童學校の創立者と爲れり。一八一三年オーエンは博愛心に富み、運轉資本に對する五分の薄利を以て滿足する同志者と共に、一組合を組織して、その博愛的事業を實行し、又その著書『社會新論』(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Princip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 1813)によりて同一思想を鼓吹せりき。…… 一八一七年頃に至り、オーエンは社會主義に向て更に一步を進むるに至りぬ。すなはち彼はその社會主義的共產組合の計畫を立て、救貧策の一法として、當時議會の問題たりし工場法の設定に盡力したることこれなり。
聖西門（Saint Simon）（一七六〇———一八二五）他是法蘭西純正社會主義底先驅。他底理想，在所謂「產業的國家」那樣新社會之建設。依他所說，在他的產業的國家裏面，當統治之任的人，對於各人必須給與職業，依着各人底勞動給與報酬；但分配上絕對平等，却是破壞或混亂社會秩序，比現時更爲不合理，更爲危險。所以，眞正分配法爲比例平等。懶惰的是社會底寄生蟲：富而懶惰的是盜賊，貧而	二　サン・シモン（Comte Henri de Saint Simon, 1760-1825） シモンは佛國の名門に生れしに拘らず、革命の際、人民黨に伍し、一時拘禁の厄に逢ひぬ。されど彼が社會主義的思想を持して、社會改良の運動を爲すに至りしは十九世紀の初頭以後なりき。社會改良に關する著書としては、產業に關する諸著書……

懶惰的是乞丐，他相信社會制度之改革，用那革命的過激方法是不能成遂的，只由言論之力可以成功。西門底弟子恩芳汀（Enfantin），巴薩爾（Bazard）等祖述，完成他底學說，稱爲「西門派」。其綱領是說：救濟現時經濟組織底弊害，不外乎全然廢掉私有財產而爲國有財產制度；但是人們底賢，愚，能，不能，是由於天賦而爲協同生活底基礎，所以分配上比例平等是最公平的。以社會爲軍隊的組織，推選賢者爲其首長，不許財產承襲，而承認個人底功績。婚配是一夫一婦，兩者有同一權利。他的學徒孔德（Comte）是社會學底鼻祖。	シモンの理想は産業的國家なる新社會の建設にありき。思へらく、社會の目的は人生に有用なる事物を作り、以て世界の平和を贏ち得るにあり。然るに舊信仰は廢れて人心を結合するに足らず、封建制度は革命により破壊せられて今や新社会建設の急を感ず。吾人は科學の教ふる所により、合理的なる新社會を作り世界の平和を圖らざる可からず。故に各國は議會を設け、實權を識者に與へて此目的を達するを要す。新社會に於ては、その統帥の任にある者は、凡ての人に職業を與へ、其社會に致せる労働の結果に應じて分配せざる可からず。想ふに絶對的平等は、却つて社會の秩序を混亂破壊せしむるものなるが故に、真の分配法は労働の度に準ずる可きなり。又新社會に在ては各人皆職業を與へらるゝが故に、各労働に就くを要す。懶怠者は社會の寄食者にして、特に富人の怠惰は罪悪なりとはシモンの叱呼せし處なりき。シモンは又社會の改革が革命の如き過激手段によりて遂げらるべきものに非ずして、印刷物又は言論等の方法により、輿論の指導の下に始めて成就し得べきを信じたり。……彼の弟子にアンファンタン（Enfantin），及びバサール（Bazard）等ありてその説を補ふべし、以て謂ゆるシモン派をなせり。シモン及其派がその産業的國家の制度に於て、私産を廢して財産國有を以て之に代へしと同時に、能・不能・賢愚等の天稟の不平等を認め、分配に於て比例法を取りたることは、集産主義たる社會主義の特色を示し、その相對的平等を本とするを明かにせしものにして、特に注意を要す。此の派の人々は又社會體制上に連隊主義を取り、遺産相續を否認し、結婚に就ても稍極端なる男女平等を説けり。此點に於てはむしろ共産主義の絶對平等主義を傳へきと云ふ可し。
福利葉（Fourier）（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和聖西門之以國家爲基礎，主張中央集權的相反，而主張以地方分權和個人自由爲基礎。他也是欲補救從來社會底缺陷，而建設理想社	三　フーリエー（François Marie Fourier, 1772-1837） …… 彼の社會改良策はサン・シモンが國家を以て立

會，依他主張：容許財産底私有和承繼；尤在依勞動之結果的收益分配法，他主張先把一定的分量分配於各人，然後把殘餘的分做十二成，以五成分與勞動者，以四成分與資本家，以其餘三成分與有才幹技藝的人。這顯然和共産主義相異，可以說是集産主義（Collectivism），或相對的平等主義———這是所謂近代社會主義底特點。	脚地として説を立て、中央集權を主としたると全く反對にして、フーリエーは地方分權及び個人の自由を本として説を立てぬ。 …… 上陳の如く、フーリエーの理想社會も、かの空想的共産主義に類すと雖、彼は私産を絶對的に排斥することなく、又遺産の相續を否認せず。特に勞働の結果たる收益の分配に於ては、その一定量を各人の生活の支持に供し、殘餘を十二分し、その五を勞働に、その四を資本に、餘れる三を才能に應じて分配するが如きは、明かに共産主義と異にして、集産主義もしくは相對的平等主義なりと云ふべく、謂ゆる近世社會主義の特色を見るに至れり。
路易勃蘭（Louis Blanc）（一八一三———一八八一）和蒲魯東（P. J. Broudon）並稱法蘭西近世社會主義底巨魁。依他主張，舉全國爲一大社會主義的組織，各人照自己能力選擇職業，發揮其才幹，按照勞動以受報酬。詳細地說：他主張生産當依各人底能力，消費當依各人底必要。只要在不擾亂社會秩序，不加危害於各人的範圍內，都以自己所需要的分量爲限度。這樣的生産分配法，和聖西門相異，以必要爲條件。又和聖西門，福利葉等單爲社會改革家，把政治和宗教分離，不依政治機關而依宗教和道德相反；却以國家爲本位，謀社會主義和政治底結合，而建國家社會主義底基礎。在他以生産底分配依着我人底能力，消費依着必要爲最公平，不否認生産底私有，以絕對的平等主義反爲不正之點，可算是近代社會主義底特徵。	**四**　ルイ・ブラン（Louis Blanc, 1813-1882）の社會改良案は其著「勞働組織論」（Organisation du Travail, 1840）に現はる。ブランは勞働の組織を變更せんがめには、唯〳〵理性と正義と人道とに隨ひて勞働に從事すべき原理・方法のみにては未だ足らず、進んで政治的勢力を借りて社會改良に資せざるべからずとなし、民主的國家の下に漸進的方法を以て社會を改良せんと企てたり。其方法は「社會工場」の組織にして、國家自らこれが經營監督に任じ、勞働者の生活を保證し、其才の適するところに從事して職に就かしむるに在り。勞働者に對する賃銀は、一般の租税、國有鐵道の收入及漸次他の産業を國營にするによりて生ずる收益を以てこれに充つ。而して幾多の工場を合して一大社會組織となし、資本家をも此聯合に加入せしめ、通常勞働者としての賃銀のほかに、出資に對して利子を支拂ふべしとなす。ブランに從へば、「生産は各自の能力に從ひ、消費は各自の必要に準ずる」に在り。されど此必要といふことには一條の制限あり。社會の秩序を害せず、他人に危害を及ぼさざる程度に於て、自然の要する分量を限とすること是なり。

蒲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竭力避去那聖西門所擁之宗教的權威和路易勃蘭所擁之國家的權威，樹立以個人底自由和社會主義爲基礎的個人的社會主義。他雖以私有財産爲不正當，説：「財産由盗竊而來」，但同時又反對共産主義，道：「共産主義是多數的劣者聚集以劫奪優者底財産的，私有財産是強者弱者那裏劫奪來的，一是弱者的專橫，一是強者的跋扈，兩者都是背理的。私有財産制度有陷於不平等的弊端，共有財産制有使各人的才能都變爲平凡而失掉其努力的弊端，兩者都不是理想的制度。」所以應當結合這二者而組織那以正義，自由，平等爲基礎的新社會，使各人自由勞動，給與公平的報酬。 據他所謂新社會底綱領：（一）排斥爲個人主義，和共産主義之障礙的私有財産制度；（二）廢除社會上底階級制度；（三）神爲善的，也爲惡的，故必排斥基督教之所謂神；（四）「財産是竊盗」，富者階級底本身已是可惡的；（五）人們不可不由勞動而所有，因而當課税於勞動的資料，財産承襲底不合理是自明的道理；（六）國家底理想政體是無政府主義———依他説來，社會最高度的完成，是無壓迫（無政府）底結合，是完全的自治。換句話説：如果人類底倫理觀念發達，社會上自由的結合達於極點；那麽，各人得爲自己的法則理法，結局便臻於無政府狀態。他雖然以無政府狀態爲社會進化底最高點；但並不是説，在現代社會就實行無政府主義。然而這無政府論，却胚胎共産的無政府主義。他在一方面反對個人主義，同時在他方面又反對共産主義，就此點看來，不能不説是發揮近代社會主義底本領。其經濟觀底根本思想，是和馬克斯相同的。	**五　プルードン**（Pierre Joseph Proudhon）の説は私有財産の否定に始まる。最初の著「財産とは何ぞ」（Qu'est-ce-que la propriêtê,1840）などには專ら經濟上より社會主義を説きしが、「革命及教會の正義」(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1858)出づるに及び、政治上にも社會主義を鼓吹するに至れり。彼が私産を攻擊するや頗る大膽にして「財産は竊盗なり」と云へり。蓋し彼は正義・自由及平等を根本的倫理觀念となし、報酬の完全なる均衡を理想とす。故に一日の勞働にはそれだけの報酬を當然とするは其經濟的原理なり。勞働の期間は卽ち價値の標準たり尺度たるべきなり。然るに財産を有する者は遊食して歡樂を貪る、これ利益を盗むに等しとなすなり。プルードンは同時に共産主義に反對せり。共産主義は多數の劣者が優者の財産を强奪するものなればなり。私産制度に在ては强者は弱者に奪ひ、共産制度に在ては弱者集まりて强者を掠む。方向異なれど正義に背くは一なり。眞理は二者の綜合に在り。卽ち土地・資本を公有とし、正義・自由・平等を基礎とせる新社會を建設し、各人をしていつにても自由に勞働せしめ、これに對して公平なる報酬を得しめんとは、プルードンの理想なりき。されど彼は社會の過渡期に於ては、私産制を漸次に廢する方法を取り、利子・地代等を漸減して其理想狀態に達すべきを主張せり。彼の政治的社會觀は無政府の狀態に在りき。謂へらく、人間の倫理觀念が進步し、社會の自由なる聯合が發達の極に至るや、各人は自己のために法則たり、支配者たるべく、其終局は無政府の狀態に至るべしと。これ理想的社會狀態に在りては、何等の形式に於ても他人より支配せらるゝ壓制を忌むがゆゑなり。此説は無政府主義を胚胎して流 弊を遺したりしが、其の個人主義に反對すると同時にまた共産主義に反對せし點は、近世社會主義の本領を發揮し、其經濟觀はマルクスと根本思想を同じうす。

馬克斯（一八二一——一八八三）底大著資本論（Das Kapital），稱爲社會主義的聖典，給社會主義底理論以科學的基礎；因此，他的社會主義也叫做「科學的社會主義」。依他講來，爲歷史上變遷和發達之根柢的，常是貨物生產和生產分配法底變遷和發達。在古代和中世，生產事業在奴隸和農奴手中，至於近代則變爲資本的生產：這是近世和古代，中世，相異的地方。所謂資本的生產，是指資本家役使勞動者，利用機械力的大規模底工場生產而言，是資本家掠奪生產之結果的制度，是人們和機械底競爭。固然近代底生產事業，依着資本制度而有了顯著的進步，發達；但其結果，竟釀成如現今的貧富底懸隔，社會上底不調和和罪惡。所以，現時的社會狀態，正是勞動者當奮起而一變其形勢的時期。他的思想，一面爲國家社會主義所採取，一面由社會民主黨傳承，是現代社會主義底一大勢力。	六　マルクスの大著「資本論」（Das Kapital,vol.1.1867）は社會主義の聖典と呼ばる、ものにて、社會主義の理論に科學的基礎を與へ、これによりて其社會主義をして科學的社會主義とまで許さしむるに至れり。マルクスは勞働を以て共產の源泉なりとす。然るに資本は不正に掠奪せる不拂勞力卽ち剩餘價格の蓄積なり。「資本制度の基礎は社會民人の共有すべき權利を掠奪するに存す」となし、極力資本制度を攻撃せり。されど彼に唯〰制度を難じたるのみにて決して貸本家を攻撃せず。彼又古來の歷史を大觀して、階級鬪爭の史なりとし、現代は資本家階級と勞働の階級と戰爭の時代なりとなせり。マルクスの社會主義は此根本思想に基けり。彼がエングルス（Engels)と共に發表せし共產黨宣言は、必しも彼の意見のみにはあらずと雖も、以て大體を觀るに足れり。共綱領は、(一)私人の土地所有の嚴禁及地代の公共的使用、(二)重き累進率による所得稅、(三)相續權の否認、(四)外國移住者及反亂者の財產沒收、(五)國立銀行、(六)交通機關の國有、(七）國有工場及生產機關の國有、(八)產業的軍隊の設立、(九)職工の聯結、(十)兒童の公共教育等なりき。彼の社會主義は、一方には國家社會主義に、他方には社會民主黨によりて傳へられ、現代の一大勢力となれり。
拉薩爾（Lassalle）（一八二五———一八六五）和馬克斯同爲德意志近世社會主義底首領。馬克斯是理論家，他是實行家；馬克斯是哲學家，他是政治家。拉薩爾沒有什麽創見，不過把勞特皤邱斯和馬克斯底學說平易地說明罷了。他不但欲保障勞動者底生活，併且欲使他們底地位增高，和資本家立於對等的地位。他說，關於勞動者和資本家間的問題，政府必須幫助勞動者，使得正當的分配。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是他於一八六三年所組織，以後在德國政界占很大的勢力（參看各項社會主義）。	七　ラッサール(Ferdinand Lassalle)はマルグスと共に社會主義の大立物なれど、マルクスは哲學者にして、ラッサールは政治家たり。ラッサールは現代を以て勞働者が資本家の產業獨占を承認せずして一層大なる權利を要求するに至れる時代なりとし啻に勞働者の生活を保證せしむるのみならず、進んで彼等を資本家と對等の地位に上らしめんと主張せり。ラッサール思へらく、勞働者と資本家との爭は既に始まれり、其解決の途は唯〰兩者の協力聯合に在るのみ。かくの如きは大工場の組織に於て始めて實行し得べきところなり、されど勞働者は其力なし、故に國家は自ら此任にあたり、政府は勞働者を窮地より救ひ、公共の生產機關を給して自

	由に勞働せしめ、其の正當なる分配を得しめざるべからず、もし此事不可能ならば、かくの如き資本家を庇護する政府はこれを覆へして可なり、勞働者は天下の大多數なリ、即ち國家なり、彼等は自ら國家を支配せざるべからずと。これラッサールの意見なりき。されど彼の政府否認の説は無政府主義者の暴論とは同じからず。政府が其の當然の職を盡す能はざる場合にのみこれを否認せしのみにて、本來は國家の力によりて社會主義を行はんと期せしなり(ラッサール參照)。

附錄 3

《新文化辭書》	《哲學大辭書》
Nihilism（英）[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是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之一派。是在俄國發生，否定一切政治的，社會的威權底激烈的革命思想。「虛無主義」一個名辭，是一八六二年，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Turgeneff）在他的傑作父與子（Otzi I Dieti）中創用出來的。如由書中人物巴薩託夫所表示一般，俄國的虛無主義者，不屈服於一切的威權，法律，不信仰無論什麼原理，原則，而欲把各人置於平等的，共產的狀態之下。虛無主義思想，不消說，是胚胎於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Bakunin），克魯泡特金（Kropotokin）；但間接也受了達爾文（Darwin），斯賓塞（Spencer），穆勒（Mill）等唯物的哲學思想，和近世社會主義者聖西門（Saint Simon），福利葉（Forier），歐文（R. Owen），拉薩爾（Lassalle），馬克思（Karl Marx）等思想底影響。總之，虛無主義者從他們底學說，得到自由平等底觀念，和對於貧民和勞動階級深切的同情之念，便急於求其實現，咒罵社會的，政治的威權，否定一切信仰而企圖破壞，所以有「虛義主無」的名稱。虛無黨一領袖爲却夫（Tkatchaf）曾借用斯多噶哲學底用語「無垢的白板」（Tabularass）以比喻虛無主義思想，可算是恰切的定義。至其所以特別發生於俄國，那是由於俄國經濟狀態和社會的階級底不	**虛無主義（キョムシュギ）** **英 Nihilism.** **獨 Nihilismus.** **佛 Nihilisme.** 一　**意義**　無政府主義の一派にして、特に露國に發生せし一切の政治的并に社會的威權を否定せむとする過激なる革命的思想に與へられたる名なり。（無政府主義の條參照） 二　**名稱及び由來**　虛無主義の名は、西曆一八六二年、露國の小說家ツルゲニェフ（Turgenief）によりて、その著『父と子』の中に始めて用ひられし所なり。此作中の人物バザロフ（Bazarof）によりて示さるゝが如く、露國主義は一切の威權に對して屈服するを欲せず、如何なる原則をも信仰せず。若し彼等に唯一の主義信條ありとせば、そはバクニン（Bakunin）の無政府主義の思想より來れる警句「人民に伍する」にあり。換言すれば各人を平等なる共產的狀態に置かんとするにあり。此れ露國に於ける農民の共產社會たるミール（Mir）をして、その專制的帝政に克たしめんとする思想なりとも見るを得べし。虛無主義の思想が無政府主義の翹楚たるバクニンの思想及びクロボロキン（Prince Kropotkin）の思想に胚胎せしや論なしと雖、間接にはダーキン（Darwin）・スペン

平均，不健全，是顯而易見的。 *俄國在亞歷山大（Alexander）二世時代，輸入無政府主義，*其初雖單取研究的態度，到了一八六六年加拉考索夫（Karakozoff）謀劃暗殺皇帝，一八六九年尼却協夫（Netchaief）組織叫做“人民解放團”的祕密結社，虛無黨就此成立。但是因爲虛無黨是祕密結社，他的主義綱領不得而知。從尼却協夫結社以後，在莫斯科（Moskva=Moscow），挪高洛特（Novgorod），奥迭薩（Odessa），該夫（Kieff）等處，虛無黨團體也繼續發生。從一八七七年直到明年，虛無黨出了二千餘激烈的人，其中有一百九十人被處流放禁錮等刑罰。一八八〇年時，盛行暗殺；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二世被這黨黨員刺死。從這時一直到一八八八年，數年之間，黨員被處刑的三千人，但他的氣焰毫不少衰。後來分做兩派：一派採溫和漸進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相接近；一派採激烈主義，用祕密手段宣傳主義，設實行機關，製造爆發物，爲慘酷的暗殺。*後者又設立祕密會所，爲該黨的樞紐；設立通信機關，保持各地方底聯絡，不但是俄羅斯全國，就是別的國裏，也有他的黨徒，巧於呼應，政府雖嚴密的監視，竟至於無所施其技倆呢。*	サー（Spencer）・ミル（John S. Mill）及び唯物論的哲學の思想とサンシモン（Saint-Simon）・フーリエ—（Fourier）・オーエン（Owen）・ラッサール（Lassalle）及びマークス（Marx）等の思想との影響を受けたる争ふべからず。即ち虛無主義は、前者よりして自由平等の觀念と、貧民勞働者等に對する深き同情の念とを得、後者よりしてはその共産社會主義の思想を得たり。而して彼等は露骨に驀地に此等の思想の實現に急進せり。是に於てか彼等は一切の社會的政治的威權を咒咀し、之を破壞せんが爲には何等の手段をも辭せざりき。一切の威權・信仰の否定、これ虛無主義の名の起れりし所以なり。此の如き急激なる思想及び之に伴う破壞的手段が、特に露國に於て行はれ、しかも多數の同志を贏ち得たる所以は、その國情の然らしむる所なり。當時露國の經濟狀態は極めて不平均にして、且つ不健全なりき。加ふるに社會的階級とその特權とは上下を乖離して社會の權衡を失はしめ、皇帝は專制權を有し、貴族の多く及び僧侶もこれに對して勢力なし。（中略） **三　虛無黨及び其運動** 露國に於ける政治的革命運動の初期はアレキサンデル二世（Alexander II.）の統治の時代にあり。虛無主義及びその徒の秘密結社たる謂はゆる虛無黨の發生も亦此時代なりき。尤もカタリーナ女帝（Katharina）及びアレキサンデル一世の御宇に於て、上流の階級には既に自由思想の萌芽を發せしが、主として思索の上に止まり實行的運動に非ざりき。然るにアレキサンデル二世の時に至り、無政府主義の思想輸入せられ、その初めは研究的なりしたが、一八八六年にはカラコゾフ（Karakozof）の皇帝暗殺を企つるあり、一八六九年にはネチャイエフ（Netchaief）の「人民解放團」と稱する秘密結社を設立するありて虛無黨なるものは茲に隱然成立するに至れり。然れども虛無黨は國情上秘密結社たるが故に、その黨員の數及び主義・綱領等もその詳細を知るに由なく、唯その成果に觀て、若しくは知られたる少許の秘密印刷物

	によりて概要を彷彿し得るのみ。ネチャイエフの結社以後、各地に他の虚無黨的團體續出し、モスコウ（Moscow）・ノヴ（Kiev）・オデツサ（Odessa）其他の要地十數ヶ所に於て明かに存在したり。一八七七年より翌七八年に到れる冬期に於て、此黨に屬する二千人餘の激論家中百九十三人は、裁判の結果、禁錮又は追放に處せられしが、爾後兇焰なほ盛にして、一八八〇年前後には暗殺頻々として行はれ、一八八一年にはアレキサンデル二世はセント、ベテルスブルグに於て、遂に同黨員を物色する極めて研究にして、一八八八年に至る數年の間に於てすら、死刑二十・追放二千餘、凡て三千餘人の同黨員の處刑を見たりと雖、虛無黨の勢力は毫も衰へざりしが、後革命黨は二分するに至り、一は穩和主義・漸進主義を取りて、社會民主々義に接近すると同時に、他は愈〻兇行主義を逞りし。爆裂彈の使用によりて、其手段一層慘酷となれり。彼等がその主義を宣傳する機關は秘密出版にして、その實行の機關は爆發物製造所なり。一八八四年卅餘各處の製造所ありきと傳ふ。又彼等は都會に密會所を設けて中心とし、秘密に通信機關を設けて地方との連絡を保ち、啻に露國內のみならず、他國にも秘密中心ありて本國の黨與と呼應し、その手段頗る巧妙にして、暗號・虛名其他の方法備はれるが故に、嚴なる政府の監視もその發現に苦しむこと甚し。此黨與には學生及び婦人の多きこと特に著しき現象なりとす。近年に至りて虛無黨の勢力少しく衰へ、且つ其主義も多少變遷して他の無政府黨と殆ど擇ぶところなきに至れり。

徵引書目

一、史料、報刊

《小說月報》，1923。
《申報》，1931-1934。
《東方雜誌》，1920-1923。
《時事新報‧學燈》，1924。
《婦女雜誌》，1924。
《華年》，1933。
《順天時報》，1923。
《新社會》，1919、1920。
《新潮》，1919。
《農商公報》，1923。
《圖書展望》，1935。
《學生雜誌》，1924。
《瀋陽高等師範週刊》，1920。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輯部編纂，《哲學大辭書》，冊 1、3、4，東京：同文館，1909、1910、1911。
大隈重信等編修，《日本百科大辭典》，卷 3，東京：三省堂，1910。
唐敬杲編纂，《新文化辭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商務印書館編，《大英百科全書評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
商務印書館編，《新文化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彭文祖，《盲人瞎馬之新名詞》，東京：秀光舍，1915。
曾樸、徐念慈編，《博物大辭典》，上海：宏文館，1907。
黃人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國學扶輪社校印‧中國詞典公司 1911。

二、專著

柯芮‧斯塔柏（Kory Stamper）著，吳煒聲譯，《爲單字安排座位的人：美國最暢銷字典的幕後，爲世界寫下定義的編輯人生》，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20。
王世家編，《青年必讀書：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二大徵求」資料彙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
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份》，卷 1，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宋恩榮編，《范壽康教育文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汪家熔，《中國近現代出版家列傳：張元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沈展雲編，《五四思想論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
周其厚，《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7。
周振鶴，《隨無涯之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柳和城，《挑戰和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茅盾，《茅盾全集第 35 卷・回憶錄一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
唐敬杲，《近代思想解剖》，臺北：廬山出版社，1974。
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所，2006。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收入《飲冰室專集》，冊 6，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
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陳平原、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啓蒙》，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
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
鍾少華，《中國近代辭書指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羅志田，《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Milena, and Rudolf G. Wagner, eds.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4.
Freeden, Michael. *Ide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Koselleck, Reinhart.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Lovejoy, Arthur O.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0.
Morgan, Evan. *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13.
Sebastián, Javier Fernández,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tander: Cantabria University Press/McGraw-Hill, 2011.

三、論文及專文

Robert Culp（高哲一）著，陳建守譯，〈定義現代性：《辭源》與現代中國詞彙的創制〉，收入沙培德、張哲嘉主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295-322。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4，2013 年 6 月，頁 3-88。

石川禎浩，〈近代日中の翻訳百科事典について〉，收入石川禎浩、狹間直樹編，《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訳概念の展開》，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3，頁 277-307。

余連祥，〈商務印書館的用人機制與茅盾的成名之路〉，《湖州師範學院學報》，2016 年第 11 期，頁 45-52。

李孝悌，〈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1 本第 3 分，2010 年 9 月，頁 651-700。

李林，〈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本來面目〉，《二十一世紀》，總期 8，1991 年 12 月，頁 21-26。

李歐梵著，楊明晨譯，〈《新文化辭書》試釋〉，《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總期 1，2019 年夏季號，頁 170-191。

張謝、戢煥奇，〈商務印書館早期英文部編輯成員述評〉，Proceedings of 2017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form and Modern Management, 泰國：ERMM，2017 年 8 月 6-7 日，頁 343-348。

章清，〈晚清中國接納新名詞、新概念遭遇的三重屏障〉，《南國學術》，2015 年第 4 期，頁 59-69。

陳力衛，〈《普通百科新大辭典》（1911）與新詞新概念〉，「歷史記憶與概念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19 年 10 月 4-5 日。

黃興濤，〈「新文化」的出版姿態、知識構建與社會傳播——1923 年商務版《新文化辭書》的歷史透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 年第 6 期，頁 158-169。

鄒振環，〈《綜合英漢大辭典》的編纂、特色與影響〉，《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2 期，頁 54-63。。

鄒振環，〈訳語「百科全書」成立、変異及び文化理解〉，《第四回漢字文化圈近代語研究會予稿集》，大阪：關西大學，2004，頁 61-76。

蔡祝青，〈從民初漢英辭典的編纂到百科名彙的確立：以「文學」詞條的發展爲例〉，「英華字典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年 8 月 24-25 日。

羅志田，〈理想與現實——清季民初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互動〉，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 271-314。

Burke, Pete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An Overview.”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ntander: Cantabria University Press / Madrid: McGraw Hill Interamericana de España, 2011, pp. 103-128.

Kurunmäki, Jussi, and Jani Marjanen. "A Rhetorical View of Ism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3:3 (September 2018), pp. 241-255.

四、網路資源

Encyclopedia Database, http://encyclopedia.uni-hd.de (accessed January 25, 2019).

Burke, Peter. "Cultural History and Its Neighbours." *Culture & History Digital Journal*, 1:1 (May 2012), http://dx.doi.org/10.3989/chdj.2012.006 (accessed March 10, 2020).

Chasing "New Culture": The Compilation and Intellectual Landscape of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Chen Chien-shou*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ublishing history of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the English title of which was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新文化辭書》. It was compiled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is article extends previous research to examine five issues: 1) the internal reform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launch of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2)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cyclopedia's editorial team; 3) th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used by the editorial team in its compilation; 4) how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compares to a similar work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5) and the ideas presented in the entries of the encyclopedia.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emerged out of the editorial need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its competition with the Chung Hwa Book Company in relation to the business of "new culture." When compared to the *New General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alphabetic arrangement of the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and the detail it contained in its entries are characteristic of a "modern" encyclopedia. Most of the compilers of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had studied in Japan, and the content of the dictionary incorporated the achievements of Japanese encyclopedic dictionaries, testifying to their influence. However, we cannot dismiss the effort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editorial team as mere "grabbism." The editorial team conveyed various terms they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the "new culture," including the popular "-isms" of the time as well as terms associated with the "debate on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life."

Keywords: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encyclopedia, New Culture movement, Commercial Press**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